

國立台灣大學生農學院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Bio-industry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College of Bioresources and Agricul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農民的農業價值轉化、再定義與實踐

—以新竹二、三重埔土地徵收案為例

The Agricultural Values' Translation, Redefinition and
Practice of Small Farmers: The Case Study of Erchongpu
and Sanchongpu in Hsinchu.



丁維萱

Wei-Hsuan Ting

指導教授：陳玉華 博士

Advisor : Yu-Hua Chen, Ph.D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February, 2013



謝誌

感謝在撰寫論文過程中一路教導、幫助和陪伴成長的師長、夥伴、農友長輩和家人。雖然仍有很多缺陷，但謹以這本論文做為我開始受到農村召喚至今兩年多生活的官方紀錄。我想在我甫進入農推系至大學畢業時，應該都沒料到我會完成這樣的一本論文。然而，希望這只是一個起點。



摘要

1980 年代開始，國家扶持高科技產業的策略，讓新竹科學園區成為台灣產業轉型過程中的發展模範。此後，擴張科學園區等現代化的發展思維持續擴散到周邊的農鄉，新竹縣竹東鎮內的二、三重埔即在三十多年前就開始面臨土地徵收的威脅，至今徵收案變更成不同的名目，徵收威脅仍在。然而，過去倚賴農業收入的農鄉，隨著幾十年的社會變遷，已轉變成以工業為主、農業為輔的城鄉交界，當地農民如何應對土地徵收，如何認知在地的發展是個重要的課題。本研究以行動者網絡（ANT）的方式紀錄並探討自 2010 年 6 月苗栗大埔怪手挖田事件而起的「新農民運動」中，新竹縣竹東鎮的二重埔、三重埔內反對土地徵收的農民，如何在反新圍地運動的網絡中行動，並與網絡中的外來知識團體台灣農村陣線和其他行動者間形成「文化轉化（cultural translation）」、捲入更多支持反徵收的支持者。最後，反徵收農民過去隨著台灣農業發展逐漸工具化、逐利化的農業價值也在抗爭的過程中「再定義」，農民看見了農業的公共性價值，且在日常生活中的農業勞動和經營實踐中也有所轉變。在運動中看到農民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是重要的，因為農民是與農業運動最切身相關的實踐者，因此他們過往所承襲的農業文化、傳統和生活記憶都會成為「文化轉化」中的要素，透過農民在農業生產上所做的品質轉向（quality turn）等實踐，也才能讓運動的內涵和意義透過實踐主體的實踐不斷堆疊、累加，成為有生命活力的動態網絡，也才能有效的進行基層動員。

關鍵字：農業價值、文化轉化、行動者網絡理論、品質轉向、土地徵收

Abstract

Hsinchu Science Park has been seen as a kind of development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under the strategy of supporting Hi-tech industry. From then on, rural area has confronted the crisis of urban expansion caused by the ideology of modernization. Small farmers, who live in Erchongpu and Sanchongpu in Hsinchu have already been threatened by land grabbing for thirty years and they are still suffering now. With the social change, the rural had transformed to be the suburb, which based on industrial rather th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issues including the way local farmers react and respond land grabbing situation and their perception of local development are very significant. Our case study focuses on the action of farmers opposing land grabbing in Erchongpu and Sanchongpu, which belong to the “New Peasant Movement” against land-grabbing induced by the event of excavators destroying the rice fields in Dapu, Miaoli County, in June, 2010. Based on the Actor Network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ction of farmers in the network of anti-land-grabbing and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caused by the external intellectual-based organization, such as the Taiwan Rural Front, in which more supporters enrolled.

In the end, the instrumentalizing and interest-pursuing value on agriculture have been “re-defined”, through which the farmers realized the public value of agriculture and the practice of their daily farming changed. The subjectivity and agency of farmers in the movement is significant because of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ovement as the practitioner. Thus the culture, tradition and the memory of farmers would be the element in the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 meaning of the movement would be continually accumulating and become a vital network which could mobilize effectively through their practice.

Key words: agricultural values, cultural translation, Actor Network Theory, quality turn, land grabbing

目錄

謝誌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目錄	iv
第一章 緒論	1
1.1 研究緣起	1
1.2 國內徵收與抗爭現況	4
1.3 研究問題與重要性	8
1.4 章節安排	11
第二章 文獻回顧	12
2.1 三大運動理論典範	12
2.2 行動者網絡理論	15
第三章 研究設計	19
3.1 田野地點概況介紹	19
3.2 研究方法	25
3.2.1 深入訪談法	25
3.2.2 參與觀察法	27
3.2.3 次級資料	28
3.3 農不太農？田野地的農村狀態	30
第四章 新圈地運動－竹東反土徵網絡的形成與捲入	35
4.1 傳統土地抗爭背景與網絡的形成	35
4.2 稻米品質提升背景與網絡的形成	44

4.3 二〇一〇年後反新圈地運動之網絡	49
4.3.1 網絡連結與形成.....	49
4.3.2 重要節點的出現與串連.....	60
第五章 土地、農業價值論述的轉化.....	62
5.1 農民乘載的文化轉化要素	62
5.1.1 農民繼承的農業文化、傳統和生活記憶.....	64
5.1.2 農民的主動能量與文化抗爭元素.....	67
5.2 以「糧食安全」的論述為例－談捲入和轉化	71
5.3 從抗爭中新生轉化的農業價值與實踐	86
第六章 結論－抗爭下農民主體如何實踐.....	94
6.1 運動型態的轉變與價值轉化	94
6.2 未來研究建議	96
參考文獻.....	97
一、國外文獻	97
二、國內文獻	99
三、報章新聞	100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緣起

初次深入探訪竹東地區是在 2010 年的秋天。該年六月甫發生震驚全國的大埔怪手挖田事件，7 月 17 號許多來自台灣各地、同樣面臨土地徵收問題的自救會成員齊聚在台北凱達格蘭大道，呼喊「一方有難，八方來援」，徹夜舉辦聲援晚會和守夜活動。隔天一早，眾人把綠油油的秧苗鋪在凱達格蘭大道上，象徵「把田種回來」、「農運生生不息」，開啟一場對抗圈地徵收的持久戰；秋天之際，在新竹當地的學生社團引介、協助下，包含筆者在內的一群學生社團成員來到竹東，希望能就土地徵收問題的始末、聆聽在地自救會農民的想法，以訪調的方式對地方脈絡關係和從事農耕者進行最初步的認識。

眼見竹東二重與三重地區的反徵收農民在近年抵抗最新一波土地徵收案的期間，與非政府組織—如「台灣農村陣線¹（以下簡稱農陣）」建立了資訊對流的關係，土地徵收浮濫的問題也躍上了各大媒體通路，引起民眾的反思、辯論，許多學者也投身於反徵收運動中、持續製造知識性論述。唯當在電視上受訪的農民、口中開始主張「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和居住權！」、「糧食自主是國安問題！台灣糧食自給率過低，為什麼還要徵收農地？」等普遍被認知是知識分子常見的語彙時，是否反映了農民放棄自己熟悉的辭彙、轉而使用他者的語言，成為被動受到外來知識分子影響的受體？

然而，透過持續的非正式日常對話、半結構式訪談、協助農事勞動等不同的

¹ 2008 年於立法院一讀的「農村再生條例」，因其寬鬆的地目變更條件以及對農村花園景觀化的錯誤定位，將造成農村毀滅性的打擊。因此，長期在各個位置上關心台灣農業問題的行動者，包括：農民、農村工作者、非政府組織（NGO）、媒體工作者、學者、作家、律師、工程師、藝術家、青年連結起來，從草根組織、社會傳播、立法遊說等層面著手努力，在這個過程中成立了「台灣農村陣線」，簡稱農陣。

互動經驗，筆者發現當地的農民在抵抗土地徵收一事上，並沒有失去自身社區的主體性，反而當地既有的歷史、文化脈絡、務農節氣等都不同程度地與抗爭行動產生連結，並進一步和外來的資源相對話、整合，而累積成為後續反徵收運動走向中的基本元素－因此形成本文的寫作動機，希望能從農民主體和其長久以來生活的周遭環境出發，呈現更多農民在運動過程中所展現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

2011 年，竹東當地一位反徵收農民獲得全國十大經典好米冠軍的殊榮，瞬時引起主流媒體對當地徵收問題的大量關注與討論，可說是將竹東的反徵收聲勢推上最高峰。隔年年初新任農業委員會主委陳保基上任，在接獲二、三重埔反徵收自救會所發的公文、強調二、三重埔地區為優質農地，質疑農委會為何要讓珍貴的農地資源被徵收後，農委會回函表示，優良農地以及特定農業區不宜開發，若國家重大建設真的需要這塊土地，「也應該以農民的意願為準。」在抗爭多年後才得到如此屬於善意的回應，看來似乎是因為「好米」的加持，讓當地成為「優良農地」的同義詞，在對抗土地徵收上顯得更有利。然而，若僅以「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來理解二重埔與三重埔地區農民在反徵收行動上的組織過程，是未能精確地捕捉到其組織動態的；在此，本文主張，其實是諸多不同的行動者（actors），由有意、無意的交往過程，得以促進想法、認同的交換甚至激盪，進而醞釀、累積出現階段的發展情勢。

因此，除了土地徵收背景外，本個案也將農業的本質－農業生產、稻米品質提升做為描繪抗爭歷程的一個環節。稻米是台灣的基本糧食作物，過去在計畫經濟階段，政府高度介入農作生產與銷售的過程，並長期抑制糧價，以確保糧食來源穩定、社會不致動亂。許多農民習慣耕種稻米，使之成為最普遍的農業作物，型塑了農村的文化和經濟面；也因此，在國際勢力頻頻叩關之際，開放稻米自由貿易對農村造成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各種以「品質」為號召的比賽活動，即是自由市場中面臨大量競爭時，迫使稻米生產由重「量」到重「質」，最鮮明的證據。以稻米為例，地方農會承辦了鄉鎮級的稻米品質競賽，並鼓勵當地農友踴躍參與，

唯有奪得區域比賽的冠軍才有進一步競爭全國性稻米品質競賽的資格。

稻米的生產對農民來說是極為生活化、與生命史息息相關的經驗，其個別投入稻米品質競賽的動機、乃至如何連帶起稻米品質與土地徵收間的矛盾點、將當地的反徵收抗爭網絡擴大，皆為本研究的觀察重點。



1.2 國內徵收與抗爭現況

以台灣各反徵收區的資料看來（見表一），台灣目前受到土地徵收威脅的土地超過 6000 公頃，多是因為不同的建設計畫而起，地點多分佈在城鄉交界，將影響上萬戶居民（尤其是鄉村居民）的居住權，若再加上尚未組成自救會和沒有管道發聲的其他未知案件，台灣的土地徵收面積相當可觀。台灣目前所有的都市計畫可以容納的人口已經超過台灣兩千三百萬的實際人口數，但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仍然以建設、發展之名，持續對地方進行土地徵收。然而，許多徵收的行政程序僅是按照既定的表面程序走，且執行手段粗糙，許多不熟悉行政程序的農民是在開始執行徵收時才知道自己的土地將要被徵收，著急卻求助無門。

由於大埔事件的發生，台灣不尋常的土地徵收開始為大眾所關注，在相關學者、NGO 組織和社區工作者的投入之下，各個反徵收區自救會已經開始串聯，希望可以打破「個案」迷思，讓大家了解台灣的土地徵收已經不是個案問題，而是整個政府傾向資本家利益的結果。發起民間版「土地徵收條例」的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指出，土地徵收條例應該在嚴謹的前提下才能進行，除了必須符合憲法第 15 條²和 23 條³的基本人權之外，還必須要有促進公共利益的事實、符合必要性、比例性前提下，作為最後不得已的手段，且完全補償權益受到損害的土地持有人，反觀當前的台灣政府卻將土地徵收當成最便利，可以隨心所欲取得私有土地的手段。徐教授進一步分析，台灣政府如此濫用強制土地徵收來做為建設手段的主要原因，除了包含台灣威權統治下所慣用的土地利用方式（歷史因素）、將不用賦稅的農地做計畫變更可以提高政府收入（財政因素）、地方派系與財團所需要的龐大利益（政治因素）等，也隱含著當權者在現代化發展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耳濡目染

² 憲法第 15 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³ 憲法第 23 條：「...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下，只看的到農地做為市場商品的意義，嚴重窄化了土地價值，更忽略了農地之於農民在文化傳承上的意義。

反對土地浮濫徵收的台灣農村陣線也表示，土地徵收除了危害人權外，過度的工業建設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並沒有真正的幫助，只會讓財團得利、炒地皮風氣大起，更不利於台灣農業的永續發展和台灣糧食自給率，因此當務之急是修改現有的土地徵收條例，讓人民權益可以得到保障、農村價值可以被重視。

自 2010 年 6 月 9 日發生的大埔事件開始，農民團體已經連續兩年在 7 月 17 日夜宿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呼籲政府立即修改現行土地徵收條例，並重視農村價值，並在 NGO 團體的協作下舉辦大大小小的記者會與行動，展現堅持「土地正義」的決心。

表一：各徵收點面積與簡介（表格由台灣農村陣線整理 2011.7）

各反徵收區	地點	開發案	土地徵收面積	備註
竹南大埔自救會	苗栗竹南大埔	竹南科技園區	154 公頃	個案保留爭議未決。
灣寶愛鄉自救會	苗栗後龍灣寶	後龍科技園區	334.83 公頃	已遭內政部區委會駁回。
竹北璞玉自救會	新竹竹北、芎林	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前身為「璞玉計畫」）	447 公頃	
竹東二重里三重里地主權益自救會	新竹竹東頭重里、二重里、三重里、柯湖里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441 公頃	訴求：終止 30 年來的限制遷建，立即解編恢復農地，保留所有耕地（440 公頃），維護竹東大圳與生態湧泉、地景，世代傳承，把良田、古厝留給後代子孫。

芎林都市計畫徵收案自救會	新竹芎林	芎林都市計畫案	19.1 公頃	芎林鄉人口呈現負成長，無辦理都市計畫之必要性。
台中后里自救會	台中后里	台中科學園區三期	0.6 公頃	對當地農業嚴重的環境污染。
彰化二林相思寮自救會	彰化二林	台中科學園區四期二林基地	631.0961 公頃 (其中 80 公頃為私有民地，其餘為台糖地)	個案保留爭議未決。
彰化田中高鐵自救會	彰化田中	台灣高鐵彰化站	183.26 公頃	
看守土城愛綠聯盟	台北土城	擴大土城都市計畫案	128 公頃	總開發面積 139 公頃。
桃園縣地鐵促進協會	桃園、中壢、平鎮、龜山、八德	變更龜山、桃園市、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及中壢平鎮都市擴大都市計畫案	500 公頃(其中農地 322 公頃，拆除建物 2.7 多公頃)	四千多戶、二萬居民面臨房屋拆除的命運，目前園林大道縮小規模，農地免於徵收，但鐵路高架化或地下化尚未定案。
烏日溪南農鄉聯盟	台中烏日	烏日溪南產業特定區計畫案	498.8067 公頃	4000 名居民將受影響，台中縣市合併後，目前本案進度暫停。
中科大雅自救會	台中大雅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	範圍共 2969.74 餘公頃，台中縣約佔 1743.43 公頃，台中市約 1226.31 公頃。	大雅是全台灣著名的麥鄉，台中縣市合併後，目前本案進度暫停。
新北市貢寮區	貢寮區 11 個整體開發區(龍洞、和美、文秀坑、澳底、福隆 1~4、桂安	變更東北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海岸)風景特定區(配合[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促進東北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景觀風貌改	177.94 公頃	區段徵收計劃範圍 102.56 公頃、範圍外經關保護區 75.38 公頃，共計 177.94 公頃

	1~2、卯澳)	善興辦事業計劃)計劃		
--	---------	------------	--	--

徐世榮 (2001) 曾在文章中提到：

Wallerstein (1979) 的 (世界體系理論) 論點與部分人類學家中鄉民研究者 Steward (1956), Mintz (1954), Wolf (1966) 的觀點頗為類似，彼等認為許多民族在受到西方強勢國家的政治經濟控制之下，原有的生計經濟已捲入以生產現金商品為主的商業體系中，他們原有的社會生活和儀式生活都遭到嚴重的破壞，在這種情況下，鄉民開始走向無產階級化，並處於國家或帝國主義的社會中的低下階級地位。鄉民的剩餘被外在優勢團體以稅收、地租等方式抽取，而鄉民就是處於這種不平等的結構關係之中。其中，國家的角色和其權力的運作是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括號為筆者所加註)

很明顯的，這些農民走出農村到都市來討公道，為的不只是自己面臨徵收的財產，也是向對於自己習以為常的身體習慣和生活方式不被看重表示抗議。這場新圈地運動的戰爭，並非是要政府以保護弱勢的姿態，給予農民一些短暫的「施捨」，而是要大家重新看到農村的價值、給予農村和都市同等的地位與尊重。

1.3 研究問題與重要性

…苗栗大埔徵收案風波持續了一個多月，在今天似乎有了落幕跡象，一般外界總以為大埔徵收案抗爭引爆點是源自於6月9日怪手進駐農田整地，但事實上整個土地徵收案早在7年前就已經啟動，直到717農民團體夜宿凱達格蘭大道，不僅讓社會感受到農民的韌性，也迫使府院積極介入協調尋求解套方案…歷經一次又一次的抗議陳情，歷經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無助，農民的聲音政府總算聽到了，整起大埔事件不僅讓台灣長久以來土地徵收制度問題浮上檯面受到正視，也象徵著基層聲音直接影響在位者決策，並且逐漸與政黨切割的「新農民運動」已然成型⁴。…

2010年717夜宿凱道行動為近幾年最大型的農民運動，甚至有媒體將這一波由新圈地運動而起的運動稱為「新農民運動」，把過去沉寂了十幾年的農業話題再度搬上檯面。然而，即使感受到這波運動的浪頭正在前行，又如何在這麼多面向同時開展的運動中找出自己的研究關懷呢？身為一個農學院的學生，過去這十幾年來，社會上對於農業的觀感是如何地壓抑、負面和誤解，筆者也深有感觸。從筆者走入農村、實際接觸農業議題開始，與夥伴們有過很多討論和思辨，但「什麼才是大家與農業越來越遠的關鍵因素呢？一般人和農民之間到底有怎樣的認知差異呢？」筆者嘗試去釐清實際在農村場域中、運動現場中看到的一些現象，找出這個自己認知的關鍵因素，當然，過去經典的農民研究也提供了不少的內心的辯思。

俄羅斯農學家 Chayanov 的經典家庭農場研究認為，農業生產中存在著特殊的鄉民經濟 (peasant economy) 邏輯。鄉民生產是以家戶做為生產單位，生產是為了維持家庭消費與再生產，而不是資本主義下的商品逐利行為，透過家庭成員投入無酬勞動，產生特殊的鄉民經濟邏輯。其中，「自我剝削 (self-exploitation)」可視為農家生計最經典的描述。然而 Chayanov 也指出鄉民的自我剝削程度是有其相對

⁴ 【2010-07-22/客家電視台/徐慧玲 林敬祐 綜合/大埔事件簿 「新農民運動」儼然成型】

自主性的，且他同時也強調鄉民的主體能動性，認為鄉民經濟行為雖然受政治經濟結構的影響，但也不全然都被這些主體外的因素所決定(Chayanov, 1996[1925]；許博任，2011)。Scott 兩本經典的農民研究，《農民的道義經濟學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和《弱者的武器 (Weapons of the Weak) 》皆以農民的實存為經驗，討論生產關係和意識形態，也各揭示了農民主體的重要和農民主動性的存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一書中提到，壓迫或剝削並非農民反抗的重點，而是當農民感受到生存的底線被挑戰時才會有所行動。至於這個生存的底線為何，則是由農民周遭所有一切生活經驗所判斷。然而，從古至今生產關係和國家治理方式的改變都持續在威脅農民的生存底線 (Scott, 2001[1976])。《弱者的武器》中則直接指出，除非農民的行為對國家構成威脅，否則農民很容易在歷史中消失；或者，農民只是做為徵召、生產、稅收等匿名貢獻者被記錄在統計數字中。但農民是具有思想的主體，因此除了會被大家明顯看到的公開抵抗外，日常形式的抵抗也是經常的存在。農民日常形式的鬥爭是為了避免公開集體反抗的風險，他們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表現出個體的自助形式 (Scott, 2007[1985])。在近期，許博任 (2011) 也在論文中解讀中科四期下反迫遷運動的農民主體，許以農村抵抗運動介入者的身分，探討在與農民共同生活、集體行動中，如何感受到農民特殊的家庭經濟與家庭生存主體性。他指出農民自有其識人之明，且即使全然陌生的官方行政壓力之下，也仍存在捍衛自身需求的爆發力(許博任，2011)。

上述的文獻都揭示了農民主體性和主動性確實存在。然而，在這波的「新農民運動」中，應該如何切入觀察農民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呢？事實上，在運動過程中反徵收農民與外界知識團體互動時，筆者觀察到，農民身上具有的某些文化特質和經驗是不同團體間可以相互理解、和農民可以理解知識份子語言的關鍵。例如：當學者在和農民討論農業問題或運動策略時，學者常會舉農民實際可能會發生的生活經驗做例子，將農業問題概念化，讓農民不會困在知識性的專有名詞上而難以理解，甚至是知識份子彼此間的討論也會用此方法，這證明農業問題必須

回歸到農業實作者身上討論才會有意義。另外，筆者也發現不同狀態的農民背後都有一個可以分析、回溯台灣農業發展的故事，足以作為運動訴求的佐證。筆者認為，這些都足以看出農民身上存有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不但讓農民可以了解知識份子，也讓知識份子可以了解農民，農民並不如過去分析農民運動中的那樣一無所有、被動弱勢，只能以過往的貢獻祈求當權者的保護，而主體性和能動性不一定是農民有意識的行為，也有可能是無意識的結果。再者，農民是會改變的，只要讓他們確實了解他們的訴求跟自己在農業上地實踐有緊密的關連，他們過往的一些想法和行為會產生改變。於是，本研究得出三個研究問題：

- 一、農民如何在抗爭網絡中行動？農民如何在抗爭中把主體性找回來？
- 二、農民的主體如何讓抗爭網絡中的不同行動者互相認同、理解彼此的目標並產生集體行動？
- 三、農民的農業價值和實踐，如何在與其他行動者彼此認同的過程中產生改變？

另外，本研究的研究重要性也有三：

- 一、深化對農民主體的認識。
- 二、以網絡互動的方式理解運動的動態過程。
- 三、強調社會運動中文化轉化對基層動員的重要。

然而，正因為網絡互動是動態、多向往來的，在整個運動的過程中不只有農民在日常經驗中轉化知識份子的語言，知識份子也在觀察、轉化這些農業既存的社會形式來擴展和闡述運動。甚至是外圍關心、參與這一波運動的一般大眾也具有轉化農民、知識份子語言和理解運動的能力。但由於本研究的重心在於理解農民作為主體，如何對知識份子的語言進行文化轉化，因此就不另增篇幅討論知識份子和其他行動者對農民文化的轉化過程。

1.4 章節安排

筆者於第一章「緒論」陳述本研究的研究動機、研究問題、研究重要性、台灣土地徵收概況和整本論文的章節安排，說明筆者從社會現象出發所產生的問題意識。第二章「文獻回顧」說明如何從既有的運動理論中反省，進而轉用行動者網絡理論來理解運動過程，使研究問題與文獻進行對話。第三章「研究設計」說明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個案研究的田野狀態和蒐集資料的策略，並強調影響田野地「農業」的相關因素和農業字詞的使用。第四章「新圈地運動－竹東反土徵網絡的形成與捲入」以動態網絡的方式呈現運動過程中不同行動者的互動與連結，並帶入當地傳統土地徵收和稻米品質提升的歷史背景，以強調所有的網絡都並非憑空而起，而是鑲嵌在歷史脈絡中。第五章「土地、農業價值論述的文化轉化」則是關注農民繼承的文化，和農民在抗爭網絡中如何與不同行動者達成文化轉化的論述實例，並提出農民如何在抗爭的過程中對農業的「想法」和「作法」有所改變。第六章「結論－抗爭下農民主體如何實踐」，總結本論文的研究結果，並指出後續的研究方向最後。

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三大運動理論典範

過往西方討論社會運動的理論主要分為三種取徑，分別是政治機會論 (political opportunity theory)、資源動員論 (mobilizing structure theory) 和文化構框論 (cultural framing theory) (McAdam, 1996; 李丁讚、林文源, 2000)。首先，政治機會論主要認為運動的發生是因「既有國家政治系統的制度結構或非正式權力關係變動，為特殊的社會運動提供了基礎」，但是這代表社會運動的發生是因政治結構或機會有所變動，這樣的觀點看不到社會運動底下群眾的狀態和主體性。其次，資源動員論強調的是「人民藉由參與、動員的正式或非正式的集體管道」對運動的形成、政治過程、目標達成的關係，這種看法雖然已經注意到社運過程中組織、網絡的重要性，但是無法說明當正式／非正式組織尚未存在前，或是已普遍大量存在後，運動為何會在某個時間點發生。最後，如果說上述兩個理論大體上是依循理性選擇學派的基本預設，將社會運動視為一種有組織與目標的集體行動，則文化構框論所強調社運的文化研究便是另一種既互補又競爭的取向 (何明修, 2004)。

構框 (framing) 一詞是泛指建立集體行動框架的過程 (Snow et al., 1986; 何明修, 2004)，文化構框論的重點則是在理念、文化元素對運動的參與、政治機會的型塑所起的作用，強調社會運動的意義建構是一種動態的過程。這種思考將對社會運動的研究開始轉向當中的文化價值、社會規範及意義、認同的社會建構過程等等，如 Snow 等 (1986) 認為，社會運動不只是意義的擔綱者，且是創生意義的過程，並在過程中將苦情 (grievances) 加以定位並創造新的認同、新的現實認知與集體化認同 (李丁讚、林文源, 2000)。Swidler (1986) 進一步指出：一、文化做為象徵、故事、儀式、世界觀、意識型態的工具，人們藉此解決各種問題。二、要分析文化的影響就是分析行動的「策略」。三、文化的解釋本身就不在定義

行動的目的，而是用於提供建構行動策略的元素。但李丁讚與林文源（2000）也提醒，Swidler 討論了文化做為實作（practice）、慣習（habitus）等面向，但對於行動者為何而行動、是否有不同行動基礎等問題沒有加以討論，且並未注意到「文化是如何可能」的問題。

何明修（2004）也針對構框論做了文獻回顧與探討，其中說明了「構框與策略」和「構框與組織」的關係。在構框的策略性作用上，意味著文化可視為一種運動資源，可有意圖的被操作，以促成運動的目標達成（Williams, 1995；何明修，2004）。這代表在社運的現場，社會運動的構框並不一定直接反映當事者的想法，而是透過高度的文化符碼包裝，帶著機會主義或利用政治風向的味道，運動者的意識形態和世界觀沒有直接表現出來，其真實的意圖被隱藏起來，表面上所呈現的是經過修飾的版本（何明修，2004）。在組織與構框的過程中，也假設為了包容更多組織參與，組織構框的策略往往是尋找組織間的最大公約數。且在建構組織聯盟的過程中，各別組織所擁有的資源和權力不盡相同，這些因素也會影響構框的方向，資源豐富的社運團體，較能將自己的意識型態、世界觀、運動路線加諸在組織聯盟中，進而主導整體的運動走向，而較缺乏抗爭經驗的居民，則可能被外來社運組織取得主導權，而被改變原有的動員框架（何明修，2004）。

這三個經典運動理論中，筆者認為文化構框論在將運動視為創生意義的動態過程此點，可作為本研究田野觀察的最佳註解，但是文化構框論缺乏交代過程中不同行動者的互動和網絡如何成為行動背後真正的基礎和動機。然而筆者以為，一個運動無法只以結果論定調，這恐淪為「看圖說故事」式的研究者個人詮釋，因此，了解從頭到尾運動中不同行動者彼此的親近與疏離、產生關係之偶然和必然等動態過程和特有的歷史記憶，將是運動為何能成形的重要參考指標。何明修（2004）也認為在社會運動提出文化訴求之前，集體行動者面對的是一連串的歷史傳統、集體記憶、政治文化的前提，這些背景素材並非他們所選擇的，因此社運中的文化創造並非「無中生有」（*ex nihilo*），而是「從事物之中開始」（*in medias*

res) 事實上，若將運動中的參與者粗略分為「實際關係群眾（如工人、農民、學生等）」、「外來社運團體」和「外圍支持群眾」，則以上三個運動理論都無法切合筆者欲探討「實際關係群眾（在本研究中即為農民）」在運動中呈現的主體影響和主動性改變，仍會限於資源、權力不平等的盲點和微觀、鉅觀視角的辯論中。且因西方經典運動理論皆屬於「現代」運動理論，難以討論仍具許多傳統、農村習性、要素的農民運動，因此，本研究僅在運動的階段性分析中使用「文化」、「意義」等作為分析基礎，整體的運動描述架構另使用部分「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概念來刻劃相關歷史過程，以及運動產生的過程中不同行動者彼此互相影響，且最後透過「轉化（translation）」產生一致的認同和集體行動。



2.2 行動者網絡理論

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並非一種單一面向的研究取徑，它可以被視為展現一種集體企圖(collective attempt)，以消除鉅觀與微觀社會分析的二元對立，讓社會與自然不再被當作各自分開、獨立的領域。從字面上來看，actor 和 network 這兩個概念的結合，是一「刻意的矛盾修飾法詞彙，它結合了結構與能動性—並消除了結構與能動性的區隔(Law, 1999)」，這暗示社會系統既非由那些被設定的社會行動者的行動所獨立操作，也並非由那些行動所決定或束縛。

ANT 打破「能動性只能歸屬於人類」的想法，也因此，ANT 所指涉的網絡是一群混雜體的組成。換句話說，網絡由一群異質性的行動者(actors)組成，包括人類、自然與技術。而能動性(agency)被概念化為一種涉及了人與非人網絡關係中的衍生特質(emergent property of relationships)(Callon and Law, 1995)。而這些行動者會經由四階段的轉化(translation)過程達到共識，並朝著一致的目標前進：(1) 問題化—定義問題，而且使行為者接受此定義；(2) 利害關係化(Interessement)—使其他行為者感受到在這問題定義中有共同的利害關係；(3) 捲入(enrollment)—則是利害關係化的結果，盡可能把各行為者納入相關的網絡中；(4) 動員(mobilization)—使自己的網絡成為其他行為者的發言人。在 ANT 的概念中，權力被視為是一種行動者互動下的關係性效益(relational effect)(Latour, 1986)，因此能動性是一種與權力類比的概念，它也是一種協作關聯的結果。能動性(agency)在過程中不斷透過「轉化(translation)」，將其他行動者捲入(enroll)到網絡中，在此過程中，其他行動的利益被集結成伍，且他們被當作網絡的一部份而被動員。然而，這並不意味所有公認的行動者具有相同的能力去捲入其他人，捲入也不必然是自願的或是深思熟慮後的行動。也就是說，作為一種關係性的現象，在一個人類(beings)、物件(things)、時間(times)與空間(spaces)之間

一樣多變的關係陣列的脈絡中，能動性可能具有無限多種的形式。因此，研究者的任務變成是要去發展網絡解釋，而非直覺性地把能動性歸因於某個行動者。

楊弘任（2007）在《社區如何動起來？》一書中提出「文化轉化（translation；原翻成「轉譯」，本研究翻為「轉化」）」的概念，認為這是將「深度動員之動員前能加以實現的發動機制」。此概念從Latour（1983）一開始提出的轉化開始，為了將這個概念修改成更適合台灣的田野狀態，第一階段楊將「單向轉化」的過程替換成「雙向轉化」，成為兩種知識興趣間相互轉化的狀態。但是不同興趣或知識間存在著理解形式上的差異，因此楊又援引Michael Polanyi所提「默會致知（tacit knowing）」和David Turnbull所提「在地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的概念，指出在特定的知識空間中，透過實作中反覆試誤逐漸熟練，最後成為銘刻在身體裡的知識，並可宣稱此知識具有普同性的意涵。楊弘任認為林邊鄉的在地農民師傅具有「實作知識」，外來農學專家具有「論述知識」，兩者是對等並列、平起平坐但原本無法互相流通的，透過「相互的轉化」的過程—農學專家能夠「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將農民師傅經年累月累積的實作知識轉化為挑戰既有農學論述的重要成分時，農民師傅才會反過來也「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將農學專家在實驗環境下所產生的論述知識納為將來實作的重要參考，也助於兩種知識型式的相互交流。第二階段的概念修補，楊認為在他的田野經驗中，不只看到兩種「知識形式」的互相轉化，也同時看到兩種「公共性想像」的相互轉化，「公共行動社團」所界定的公共性是從領域或範疇來界定，而「村落傳統組織」所界定的公共性是從動機或道德來界定的，兩群人擁有不同的文化習性。在楊的田野中「個人掃街行動」做為一開始挑動大家公共性神經的引子，最終在地師傅義務性投入在地社區營造的身體實作成為結合兩種文化習性的因素，既是實作優先的知識形式、又是因義務實作帶來的公共性想像。黑珍珠之鄉的社區總體營造個案之所以動得起來，不只是隨著某些外來專業團隊的進駐與離去，也不只限於特定地方頭人小圈子的活動，其中的關鍵機制就在於：「公共行動社

團」與「村落傳統組織」之間，就其相互差異的關注興趣、行動模式與文化習性，必須形成有效的「文化轉化」（楊弘任，2007）。進一步探究黑珍珠之鄉的社區能動過程，從村落中掃街行善的個人，到村長發起的掃街義工隊，讓帶有公共行動意涵的「傳統善人行動」與「社會改革行動」逐漸銜接起來，外來公共組織（東港溪保育協會）和在地宗教性行善團體（屏東慈濟功德會）和其他在地公共性團體（文史工作室和民主促進會）在過程中，偶然又必然的接觸、磨合、衝突，最終互動出互相彼此認可的行動標的（stake）。然而，這些因素的搭配都不是不同的行動者一開始共同計畫好明確的行動標的，並一起往目標前進，而是在過程中，不同的行動者陸續出現，讓整個社區的能動性隨之轉變。

二重埔與三重埔地區各自獨立的生產農戶，與威脅自家土地的徵收案一同生活了三十多個年頭，從早期以包圍科學園區、向縣政府丟雞蛋的肢體抗爭，以至面對最新一波區段徵收案重啟（民國 95 年，以都市計畫法之名）後，地方居民結合、重組「竹東二重里三重里地主權益自救會」，行政文書與肢體抗爭從未止息，唯偶然地在 2011 年該區域誕生一全國經典好米比賽冠軍得主後，地方居民遂打著良田好米的認可，轉而以「保護糧食」與「糧食安全」等議題作為現階段集體抵抗土地徵收行動的核心精神；在此過程當中，不只民眾抗爭行動的組織技術有所形變，學術語彙的滲入也顯示、牽涉了社區內外新行動者的加入／捲入，不但在運動上產生階段性的成果，也讓在地反徵收農民對「農業」有了新的認知和實踐。

在透過近年引起關注的地方性與全國稻米品質競賽、試圖勾勒出竹東地區土徵抗爭史的面貌與轉折之前，爬梳鑲嵌於其中許多利害關係「捲入」以及如何捲入的過程—包括人／非人行動者、中介者（intermediary）、守門人（gatekeeper）等之間社會網絡建立的關係是至關重要的，因為簡易的網絡概念、或群聚研究中討論的面對面（face-to-face）互動已不足以完整地闡釋本文中農村居民建立連結的特質，社區內、外的個體或群體之間也並非僅存扁平、單向的互動，而更可能是在關注的共同焦點基礎（無論是農事、還是反徵收的立場等）上，逐漸累積出相互

的默契、認同，甚至促成合作性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這也是行動者網絡理論之所以應用於此的主要原因。

最後，當代談及地方發展時，許多文獻討論會從「社區」的角度切入。1994年文建會開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將社區視為具有共同理念的行動團體。然而1996年開始的「地方文化產業」政策，也開始造成「地方文化商品化」的問題，許多以「地方文化產業」或「文化觀光」為發展主軸的鄉村社區營造盛行，如白米社區的木屐、平溪天燈、九份老街等。在此過程中，大部分被公眾視為成功發展典範、大量關注的「社區」都是農村／鄉村地區，這些在農業生產沒落、面臨困境的農業生產區，透過社區力量的號召重新被大家看到，這樣的發展令大家為之振奮。在農村／鄉村社區中地方文化產業的興起固然可視為是新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黃應貴，2006），但一方面地區文化產業的發展，也像是在反映農村居民無法各自著重在農業生產上，必須另尋共同發展主軸的苦衷。本研究的田野地域則是仍以農業生產為本質，使得區域內許多行動者的行動仍然圍繞在農業生產上，然而這些行動可能因而隱藏於容易被忽略的日常生活邏輯當中，因此如何強調、解釋農民日常生活邏輯所存在的動能將成為接下來的重點。

第三章 研究設計

3.1 田野地點概況介紹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的方式，以網絡的方式重新檢視農民投入抗爭中與其他行動者互動，了解農民對農之理解和實踐的轉變過程。個案研究為一種研究策略，面對想要了解的複雜議題和現象，研究者在符合研究主題的地點中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個案，並進一步蒐集資料和分析，以達到釐清或深入了解的目的。個案的單位可從一個人、家庭、組織、族群、社區、學校，甚至是一個事件或問題，在個案研究中質化或是量化的研究方法皆可以使用，資料來源可以很多元。

筆者選擇位於新竹縣竹東鎮的二重里與三重里（俗稱二重埔與三重埔）為本研究田野地點的原因如下：

1. 此地位於新竹科學園區旁城鄉交會之際，正可顯現出台灣典型農村在都市擴張時所會面臨到的發展矛盾。早在三十年前（1981年）就因新竹科學園區三期用地的擴張而面臨土地徵收，當時即引起在地居民的強烈抗爭，徵收案也因此持續拖延。2000年時，新竹科學園區終因經費不足而放棄二重埔的土地徵收。然而，2006年時，新竹縣政府以BOT（Build, Operate, Transfer：由民間企業協助出資興建，營運一段時間後再將所有權轉移給政府）的形式解決資金問題，由廣昌資產管理公司得標後，當地的土地徵收再度啟動（台灣農村陣線，2009）⁵。
2. 呈上述，此地面臨土地徵收歷史悠久，當地居民對於土地徵收的想法已經脫離了初面臨徵收時的不知所措與慌亂，經過長時間的思考與了解，多已依其各自

⁵ 出自台灣農村陣線所出版的「2009 夏耘農村草根調查」，資料為三位作者在二重埔當地訪調、詢問當時與土地徵收相關之人士所得。

的想法有了因應的行動，因此也才能往回探索抗爭能量是如何累積與產生，以及從農民的論述、行動中看出他們的轉變。

3. 最後，則因為筆者對於當地的土地徵收狀況和資源網絡已有初步的了解。筆者在 2010 年 10 月首次進入田野地，之後兩年陸陸續續參與過幾次由台灣農村陣線和捍衛農鄉聯盟⁶（以下簡稱農盟）所舉辦的農民行動，接觸到當地面臨土地徵收的農民及鄰近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內關心土地徵收事件的學者和學生等相關人士。當地反徵收農民為了讓大家可以進一步了解當地反對土地徵收的想法，對於外來訪客也相對容易接受。

以下則針對本研究的田野地點－新竹縣竹東鎮的二重埔與三重埔的地方特點做簡單說明：

一、土地徵收現況

二、三重埔地區的徵收案屬於「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新竹縣轄部分」，總共使用土地 441 公頃，實際徵收區域包含頭重里、二重里、三重里與柯湖里。因為 2006 年的抗爭是由二重埔自救會所發起，此徵收案才逐漸為外界關注，因此這個地區的徵收案多用二重埔來通稱（台灣農村陣線，2009）。該地區的自救會考量到頭重里、柯湖里的被徵收地地主多是外來買地的投資客，而二重里、三重里的地主多為久居此地的居民，估計有 90% 是有實際在務農的農民，故自救會的名稱以二、三重埔為名，並不涵蓋同在徵收區內的頭重里和柯湖里⁷。其中，預計徵收的 441 公頃中，「工業專用區」和「工業區」

⁶ 2010 年 6 月大埔事件過後，各徵收區自救會感受到土地徵收的急迫性，開始積極串連、彼此鼓舞、分享經驗。在 2010 年的 717 夜宿凱道行動則由聯合自救會和台灣農村陣線共同發起，2010 年 8 月 4 日農民聯合自救會正式更名為「捍衛農鄉聯盟」，由二重埔三重埔自救會的會長農民 C 擔任捍衛農鄉聯盟的會長。

⁷ 自救會的名稱考量原由是從竹東二重埔三重埔自救會會長農民 C 口述所得。但是對於該自救會反對徵收的訴求範圍則為該都市計畫全區，並不只限於二、三重埔的土地。由於筆者認為，土地是否實際從事農業生產是「農村」是否續存的認定前提，因此將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劃定在務農比例高的二、三重埔，而不討論其他的土地利用方式。

僅約 50 公頃，「住宅區」則多達 164 公頃，約占總體用地的五分之二，儼然像是大型的住宅區計畫。而目前台灣的土地徵收案中，像這樣以公共利益之名行更變地目之實則為普遍的現象。在整個漫長的徵收作業期間，竹科三期預備用地的徵收限制遷建使得鄰近地區的農村房屋破舊、人口外流、農地買賣尤其熱絡，但是土地徵收計畫的連帶效應也讓科學園區旁保留了一塊 30 年來未曾被水泥文明所入侵的農村田野。目前當地徵收案由於這兩年對於台灣各處對於土地徵收的抗爭和串連行動，以及 2011 年徵收區農民種出十大經典好米而暫緩腳步，但是案子沒有撤銷就代表危機仍未解除，當地反徵收農民在日常耕作之餘仍隨時在注意縣政府的動向。

二、歷史沿革與地理水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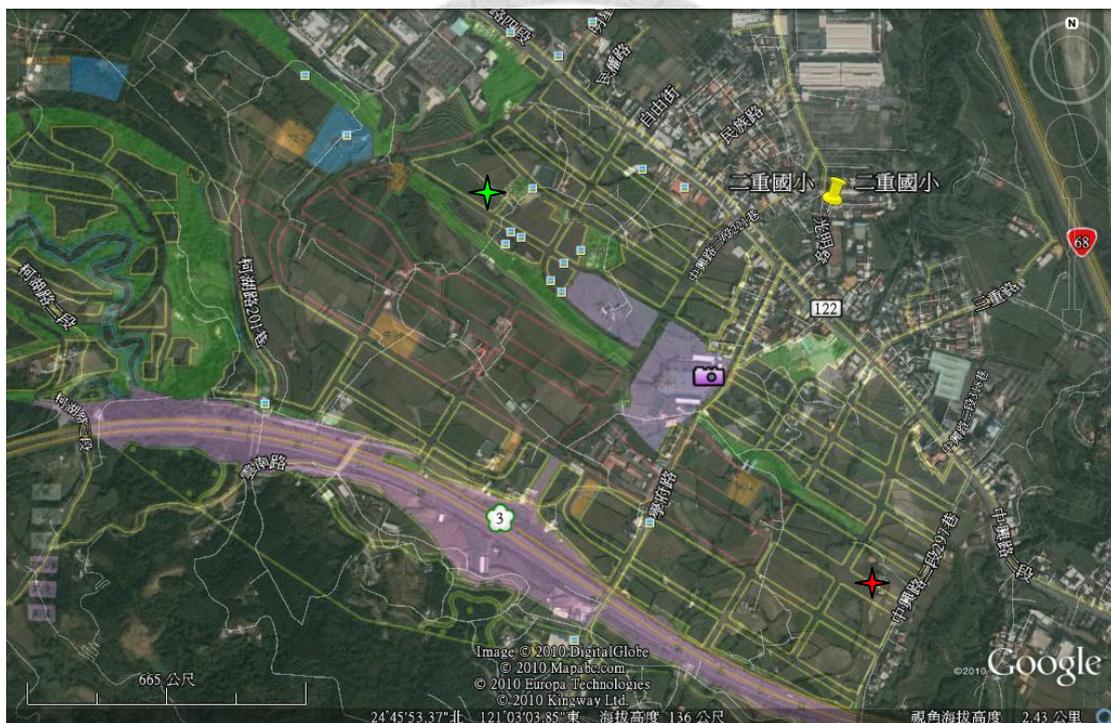
竹東鎮位於頭前溪中、上游的內陸地區，處於新竹地區通尾山地的交通要衝上，而且是附近鄉鎮的交通樞紐，在清末往東部山區的開發史上占有極大的意義，也因其特殊位置適宜作為貨物的集散中心，因此成為一個傳統的山麓市鎮，進而帶動竹東的地域發展。而二、三重埔的拓墾則是於道光 13 年（1833 年）開始。

頭前溪及其上游的上坪溪為流經竹東鎮之主要河流，不僅提供竹東地區主要民生用水，更是工業用水及灌溉用水來源。於日治時期興建的竹東大圳，攔取上坪溪流水為水源，由二重埔第一代大地主林春秀協同地方人士在民國 15 年聘請日本技士興建，21 公里水圳道灌溉面積達 530 公頃，受益面積 800 公頃。後因新竹與竹東地區用水日漸缺乏，新竹科學園區成立後又需要大量用水，故興建寶山水庫，引竹東大圳之水源供應竹科地區之用水。

二重埔為新竹通往竹東鎮內的門戶，享有重要地理位置，在日據時代是一個典型小部落，地型雖小確樣樣俱全，如舊有鐵路與陸路是重要交通樞紐，當地地主林春秀老開鑿竹東大圳，讓二重埔享有大穀倉的美譽。在科技潮流下，還保有

地方農業氣息，有獨特風土民情，當地俱歷史特色的古蹟如上員車站、林春秀故居。信仰中心則為當地的五穀宮，每年有三次廟會，以及百人搓湯圓祈福活動，五穀宮前面的廟埕廣場也是社區活動的主要場所。社區居民百分之八十為客家人，鄰近工研院，也是科學園區的後花園，有許多的科技移民。

三重埔地形狹長，面臨中興路段之長度近四公里，有近兩百年歷史之國王宮一座及萬善寺一座。緊臨工研院、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及行政院同步輻射中心與新竹科學園區，里內有三陽、福特、裕隆及中華汽車等大展售廠，里內各項汽車、板金、定位、烤漆、引擎修護等公司林立。



圖一：用 Google Earth 與縣府都市計畫圖重疊來看，農民 A 的田地（紅十字）與農民 C 祖厝傳經第（綠十字）一帶的農田（以白線簡略圈劃），便是未來住宅區（黃色格子）與商業區（紅色格子）的最大分布區。因三十年前竹科三期計畫的禁建之故，此地雖改劃工業區之名，但實際上仍大致是一片約一百公頃、未受都市干擾的農村景致。（圖片出自 2010 夏耘農村訪調文集）

表二：竹東鎮之耕地面積與墾殖率，1930 至 2000 年。(單位:公頃)

年度	總耕地面積	實際耕作面積	墾殖率%
1930	3255	2940	90.32
1940	3470	3034	87.44
1951	5351	2646	49.45
1960	5351	2837	53.02
1970	5351	2557	34.77
1980	5351	2344	43.80
1990	5351	1833	34.26
2000	5351	1830	34.20

(資料出處：竹東鎮誌－經濟篇)

表三：竹東鎮農業戶口統計，1930 至 1994 年 (單位：戶、人)

年 度	總戶數	總人口	農業戶 數	農業 人口	農業戶 數%	農業人 口%	總戶均 人數	農業戶 均人數
1930	2577	16120	658	3733	25.53	23.16	6.26	5.67
1940	3799	21475	839	4767	22.08	22.20	5.65	5.68
1951	5377	30203	2146	15232	39.91	50.43	5.62	7.10
1960	8282	45101	2246	18619	27.12	41.28	5.45	8.29
1970	10500	60000	2820	20508	26.86	34.18	5.71	7.27
1980	12866	69676	n.a.	n.a.	n.a.	n.a.	5.42	n.a.
1990	16688	75858	2647	15104	15.82	19.91	4.55	5.71
1994	9231	80644	2320	14190	12.06	17.60	4.19	6.12

(資料出處：竹東鎮誌－經濟篇)

表四：竹東鎮專兼業農戶戶數分配，1970 至 1995 年（單位：戶、比例%）

	1970	1980	1990	1995
農牧戶數總計	2814 (100%)	2891 (100%)	2689 (100%)	2309 (100%)
專業農牧戶	773 (27.47%)	54 (1.87%)	191 (7.10%)	309 (13.38%)
兼業農牧戶合計	2041(72.53%)	2837(98.13%)	2498(92.90%)	2000(86.62%)
以兼業農牧為主	997 (35.43%)	609 (21.07%)	219 (8.14%)	64 (2.77%)
以兼業為主	1044(37.10%)	2228(77.07%)	2279(84.75%)	1934(83.76%)

（資料出處：竹東鎮誌－經濟篇）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新竹縣竹東鎮的二重里與三重里（俗稱二重埔和三重埔）為研究個案，在進入田野之後，考量研究目的與實際可行性後，採用深入訪談法和參與觀察法。另外，為了避免筆者陷於主觀詮釋中，同時蒐集多種次級資料進行研究。而本研究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建構在行動者網絡理論過程性的本體認識論之下（林文源，2007），又稱「行動本體論」。反思於過去傳統的認識論，為了不將真實視為一種先驗式的存在，行動者網絡理論藉由探究造成存有物的具體萌生過程，尤其是物體由甚麼都不是，到成為被我們以特定方式處理而能穩定下來被認識的「客體」，行動者網絡理論認為所謂一般性存有其實是一般過程造就的結果。

因此，本研究透過幾種不同的資料蒐集方式，試圖呈現出抗爭過程中農民與其他行動者間的真實，從動態變動的過程中理解農民的主體性。深入訪談法是從網絡行動者的主體表述來理解他們的認知；參與觀察法為透過研究者的近身觀察來檢驗他們主觀上（試圖呈現）的陳述；次級資料則是作為一般媒體或大眾認知的運動過程。從不同的視野來呈現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動態過程，並型構出整個反徵收網絡的形貌和重要節點所在。

3.2.1 深入訪談法

訪談法又分為結構性訪談、半結構性訪談與開放式訪談三種方式，其中以半結構性最為普遍使用。Byrne 就認為：

作為一個研究方法，質性訪談對於評估個人態度與價值，這些不盡然能夠被觀察或納入正式問卷的事格外有用。相對於封閉式的問題，開放式或較具彈性的

問題較可能獲得更深刻的回應，也更能反映受訪者的觀點、對於事件的詮釋、理解、經驗與意見。(Byrne, 2004)

本研究從訪談中了解當地農民從三十年前就開始抗爭的原因，和在2010年後反土徵網絡連結得以建立的各種因素，並了解農民和其他重要參與者在抗爭過程中的想法和實踐之轉變。然而農民的想法在長期的轉換下可能有各種意想不到的價值在其中，因此採用半結構式訪談，讓受訪者有較多自由，研究者得以引導談話方向的詢問方式，但也不至於像開放式訪談一樣容易偏離主題。深度訪談的本質是由訪問者建立對話的方向，再針對受訪者所提出的若干主題加以追問 (Earl, 1988)。藉由訪談，可以瞭解當事人的想法與意義之建構，使當事人回憶過去發生的事情，並藉此與觀察中所獲得的資料進行相關驗證 (陳向明, 2000)。

受訪者的選擇當然是從當地抗爭農民開始，農民C無疑是在地抗爭社群中最重要角色，除了會長的身分獲得其他反徵收農民的力挺外，也因為年輕時在外經營工程經歷豐富，所以對於各種流程、法規等掌握度都很高，所以面對抗爭可以十分快速召集大家做出各種應變。而農民B和農民C則因為活躍於當地稻米競賽中，剛好又是當地自救會的成員，所以便漸漸成為大家連結土地徵收與農產品質的代言人。然而二、三重埔當地的抗爭在與外界接軌之後，產生很大的轉變，因此也將建立連結的台灣農村陣線成員D與在幾次全台大型抗爭活動上扮演重要角色的E加入訪談對象中。最後，因為當地徵收議題透過B與C兩位農民參加稻米競賽而獲得更多的支持和散佈，因此也將推動稻米競賽的農會指導員F納為受訪者。

表五：本研究六位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角色與代號	性別	背景描述
二重埔農民 A	男	近五十歲中年農民。年輕時在外從事紡織生意，十餘年前決定回鄉當專職農民。2010、2011、2012年竹東冠軍米冠軍得主，2011年全國十大經典好米得主。為二、三重埔自救會之成員。
三重埔	男	近八十歲老年農民。年輕時從事畜牧業，配合政府離牧政策中年

農民 B		轉業務農。為二、三重埔自救會之成員。
三重埔農民 C	男	六十餘歲老年農民。土木工程專業，年輕時開過營建公司，對新竹當地的土木工程、營造、園藝熟悉，對於程序、公文等相對熟悉。從年輕就有蒐集剪報的習慣。目前會接一些園藝規畫，其他時間就是處理抗爭事務。為二、三重埔自救會之會長，同時也是聯合自救會「捍衛農鄉聯盟」的會長。
台灣農村陣線成員 D	男	農陣成員，專業為網路程式，但從小在農村長大因而關心農業。因為在新竹居住和工作的關係，成為最先接觸竹苗地區土地徵收案，進而連結網絡的人。目前在新竹實驗社區支持型農業。
台灣農村陣線成員 E	女	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從 2010 年 717 行動前開始跟二、三重埔當地自救會互動頻繁，主責兩年 717 的相關細節規畫，並持續參與捍衛農鄉聯盟的行動和討論。
農會農事指導員 F	男	高職畜牧科畢業，早年在農會負責毛豬共同運銷業務，為目前竹東地區主要的農事指導員。與農民 A 年紀相近。

3.2.2 參與觀察法

觀察法最早是應用於人類學的研究中。人類學家普遍認為，想要真正瞭解一群人勢必要投入相當長的觀察時間，而過程中可能包含學習當地語言和參與社會活動 (Silverman, 2004)。為了可以「第一手」瞭解世界，研究者必須要親自參與，而不只是從旁觀察研究對象。參與觀察法正是立基於此種信念基礎：

某種程度上，所有的社會研究形式都是參與觀察法，因為我們無法在不至身其中的情況下來研究社會世界。從此觀點來看，參與觀察法並非某種特殊的技術，反而是研究者必須「與世界同在」的共同特徵模式 (Atkinson and Hammersley, 1994)。

參與觀察法可分為參與式觀察法及非參與式觀察法兩大類。在參與式觀察法中，觀察者和被觀察者一起生活、工作，使觀察者能夠在密切的相互接觸中直接

觀察被觀察者。此外，觀察者也可以隨時詢問相關問題，並且可以藉由觀看被研究者之行為而發問。這樣的方式較為靈活而彈性，允許研究者能夠根據研究問題及當下情境之需要而調整其觀察的目標、內容及範圍（陳向明，2000）。

由於農業本身的性質與其他產業不同，農業是以勞動和生產為本的「生活方式」，因此當地反徵收農民在抗爭之於是如何從事農業、如何看待農業，當然會與他們不願意土地被徵收有關。因此，本研究選擇參與式觀察法，主要是希望藉由參與農民行動與日常生活，觀察農民在自然情境中的行為和話語習慣，捕捉其中細微的。

筆者從2010年的十月首次接觸田野地後，在之後的兩年中陸陸續續以反對土地徵收的聲援者和組織工作者的身分，參與竹東當地自救會或台灣農村陣線與捍衛農鄉聯盟所舉辦的數場培力工作坊、共識營，還有農民A、農民C等各自所辦的體驗農事活動，以及學生社團的農村探訪活動。除此之外，因為各式與土地徵收相關的抗爭行動，筆者也和農民A、B、C有許多在竹東外各種場合遇見的機會，如記者會、聲援行動或是大型的抗爭行動等。最後，筆者在2011年十月至十一月中間，短暫且間歇的居住在田野地，參與以農民A為主的當地農事與農民日常生活。

3.2.3 次級資料

為了避免對訪談內容和觀察內容做出過於主觀的詮釋，筆者同時也蒐集了其他的次級資料：一、三十年前至今與田野地相關的土地徵收和農民抗爭之報紙，主要呈現出一般大眾可以接收到的土地徵收相關訊息，因資料取得上的便利主要以聯合報系為主，其他報導為輔。二、近年公民記者報導之土地徵收相關文章，分別有 PNN 公視議題中心、台灣立報、部落客 Munch、獨立媒體朱淑娟等的線上報導和部落格。這些報導與一般主流報導的差異，在於這些公民記者多有持續追

蹤土地徵收議題，除了公開的抗爭活動外，與反土徵農友私下也有互動接觸，所以比主流報導的內容更加深入且細緻，並可以呈現出農人在主流報導之下的面貌。

三、農運團體近兩年為反對土地徵收所發之新聞稿，可以看出運動主要論述的轉換。透過這些次級資料，的確可以看出整個反土徵運動在論述和關注焦點上的轉變，由此也可以與受訪者的訪談內容互相補充。



3.3 農不太農？田野地的農村狀態

到這裡為止，不知道大家是如何想像本研究田野的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状态？在台灣的发展脈絡中，農村是很明顯的起始點，但受到國外「鄉村研究」影響之故，近年來「農村」與「鄉村」在用字的意義沒有明確或刻意的區隔，兩個詞經常被混用或挪用。相較於比較偏向對空間特色之描述的「鄉村」，筆者在本研究中刻意使用「農村」一詞，是想強調農／鄉村之所以是農／鄉村，是因為其具有農業生產的本質，農產業結合了在地以此為生的聚落和生活方式，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農／鄉村樣貌。再者，「農業」、「農村」和「農民」等字詞在學術探討中都有其特定指涉的意義，本研究的探討層面為何呢？簡單來說，筆者關心的是廣泛的農業發展，而本研究則將與農業有緊密關聯的「農民」當成主要研究對象。雖然在整個網絡的過程描述中無法避免帶入在運動中同時扮演重要角色的外來知識團體及一些政府與民眾的因素，但是重點還是在凸顯農民的主動力量，這些力量可能是有意或無意的，產生的起源乃因農民長期以來與「農」共處所生。然而，筆者所說的「農」是指「產業面」還是「職業面」？正如過去許多社會運動討論當中，農民常常會被當成一種階級或一種群體來討論，而「農村」與「都市」是二元對立的關係：「農村」具有很多傳統的習性、農民具有保守的性格等等，農村中的人稱為「農民」，主要以「農業」這項產業維生；「都市」是各種現代性要素匯集的空間，對照「農村」中的「農業」，都市中的居民主要是以「工業」和「服務業」維生。然而正因筆者在田野地所看到的農村狀態並非如此鐵板一塊，本研究才選擇採用網絡互動的方式來描繪整個運動過程。故，本節將進一步說明田野地的農村狀態和相關細節，並解釋如何看待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農業相關用詞」。

首先，二、三重埔本身並非典型的農村，緊鄰新竹科學園區和工業研究院旁的她是典型城鄉交界型城鎮，其發展當然也深受科技園區的影響。竹東主要道路中興路的一邊是從 1979 年就開始計畫徵收的禁建區，另一邊則是沒有受到禁建限

制，隨著新竹發展開始大量開發的都市計劃區。一條路的兩旁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而在徵收區內反對土地徵收的農民主要是在禁建區內，長久以來與農業共存的一群。然這群在禁建區內生活的農民，分殊性非常大，隨著台灣社會的發展和農業政策的改變，他們的農業價值和實踐當然也有所轉變。

相關研究提到，台灣農民皆受到內、外趨力的影響產生農民分化，外在趨力是指大社會對鄉村農業生產者分化的影響，以國家的農工部門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性質及階段為首要考慮；內生趨力則是個別農戶內在特性的差異如何導致他們走向不同的分化途徑（柯志明、翁仕杰，1991）。黃俊傑（1985）提到，在台灣農業商品化的過程，朝資本主義看齊的經濟特性也使部分農民的農業生產方式改變，台灣農民從民國 40 年代的「同質性」走向「異質性」，農業生產趨向多樣化，農家所得差異拉大，兼業農戶大為增加，進而產生農民分化。柯志明與翁仕杰（1991）也認為，傳統的農民研究一向試圖找出農民共同的核心特質，把農民當成一個同質團體（或階級）來處理，然後從這一點出發來說明外來者如何榨取農民的剩餘。然而，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滲透及支配之下，台灣的農民早已不是一群共同面對外來支配者及剩餘榨取者的同質團體（柯志明、翁仕杰，1991），他們在生產方式、栽種作物、兼業狀況、資本形態等條件上都出現許多分歧。

而若以農民的農業價值來看待整個轉變的過程，也有跡可循。吳聰賢（1985）將農民性格解釋為「農業社會價值規範表現在農民生活和生產上的個人身心行為特質和角色的總稱」。台灣農民的性格和對土地的想法一直都被刻畫成因應農業發展狀況和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產生變動。在農村普遍經歷現代化之前，吳聰賢（1970）認為中國傳統鄉民具有七種性格特徵：（1）自給自足、不求利潤；（2）生產方法以畜力和人力耕作為主；（3）精神及物質生活上鄉民重視精神生活；（4）有強烈的家庭觀念和親屬關係；（5）有深厚的鄉土觀念；（6）對經濟抱著有限資源的觀念，因而缺乏革新之動機；（7）缺乏計量較酬的習慣。廖正宏和黃俊傑（1992）

則延續農民性格與價值之研究，認為光復初期土地改革完成後，農民對土地有了強烈的認同感，且多數農民認為只要擁有自己的田，生活就會漸漸改善。因為土地改革的成功大量提升了農業成長率、提升農民的生活，也讓農民加深了「以農業為生活方式」的價值觀，這個時代的台灣農民根植於土地，他們勤奮務農，生死以之（廖正宏、黃俊傑，1992）。1970年代，在長期重工輕農的脈絡下，農業危機益發嚴重，1973年制訂的《農業發展條例》使得合法的「炒地皮」開始在農村地區出現，也是台灣土地商品化的起始點。廖正宏和黃俊傑（1992）認為在這個時期，農民已把農業視為副業，但是卻不願意輕易放棄土地，乃因他們認為土地仍是一種較有保障的商品，在經濟不景氣時，還可以作為最後的退路和保障。這時候的農民隨著農業技術的持續提升和台灣「經濟奇蹟」的來臨，已經從土地中游離出來，將土地視為商品的心態日益明顯，成為充滿營利取向的「現代化農民」，並「以農業作為生活的手段」。且農民的價值取向也逐漸轉變為現代的類型：在自然取向上，由傳統的順服或與自然合諧相處轉變為主宰取向；活動取向上，代表華人傳統修生養性的「內修」比例下降許多；關係取向由團體轉向以個人取向為主。而農民的農業價值則可能直接反映在農民對農業創新和農業經營的態度上（廖正宏、黃俊傑，1992）。

除了土地的因素之外，生產結構的轉變和生活水準的提升也讓鄉村居民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跟著改變。楊懋春（1970）就指出土地改革之後鄉村居民不再那麼保守，他們重視教育，因為教育可以讓他們活得更高的社會地位，也更容易在耕作方法上接受新方法和新知識。鄉村居民的生活趨於複雜化、平面關係增多，氏族關係則逐漸式微。對老年人來說，地緣上安土重遷的觀念仍舊非常深刻，但是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則相當嚮往都市，不再以務農為世業。幾乎所有相關的研究都同意，台灣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到工商社會，兩者的社會結構價值和觀念迥異，農民性格也連帶跟著蛻變。然而，關於何種觀念改變的多、何種觀念改變的少、何種觀念未曾改變等這類的問題，研究極少（廖正宏、黃俊傑，1992）。九〇年代

之後，農民性格或農民與鄉土的連結幾乎不曾被拿出來討論，這讓大家更容易忽視農民間的差異性和轉變，和仍有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除了經濟上的因素外，還有哪些生活特性和需求。

從上述文獻可看出許多因素共同造成現今台灣農村的異質現狀，雖然並沒有辦法完全套用在田野中，但是也算對目前的狀態做了部分的解釋，而在城鄉交界的竹東所受外在的影響更加劇烈。面臨土地徵收的二、三重埔中，土地的擁有者除了久居當地的居民、農民外，也有許多投資客見土地徵收有利可圖，從無意繼續務農、想釋出土地的農民手中取得的農地所有權，期待土地變更後所獲得的巨大利益。當地土地的利用方式除了生產農作之外，還有許多休耕、蓋了鐵皮工廠或是填平造景的農地。農民的營生方式除了一些上了年紀的專業農外，更多的是在外有專職工作的兼業農和以種植景觀作物為主的農民。台灣的發展歷程造成人地關係的剝離與異質化，但是政府始終沒有去面對、以適當的政策因應這樣的農村現況，反倒是持續傾向資本家，不斷消費、剝削農村剩餘的價值。

有趣的是，反觀本研究中所直接面對的反徵收農民 A、B、C 等，原本做為竹東農村居民的他們，同時也因為成長在城鄉交界的緣故，個人成長歷程和工作際遇上讓他們具備不同的特質和能力，這些特質和能力在往後新圈地運動的反土地徵收網絡中卻成為偶然又必然的力量。舉例來說，農民 A 因為過去經營紡織業，有在外跑生意的經驗，人面和見識較廣，也了解人脈和訊息是事業上很重要的關鍵，因此成為專業農後十分注重與農會、改良場間的關係，也參加許多農業培訓課程，認識台灣各地許多農友，了解不同農友的生產狀況和技術，同時也增進了自己對農業的了解。過去做生意的態度也讓他對於經營農業更有企圖、更敢嘗試新事物，最後在農業生產上終獲得好成績。農民 B 從早期開始致力於自家的畜產經營，很早就結識了農會的輔導員，透過其輔導轉種稻米雜糧，因為自家農地面積較大，除了稻米雜糧外也種很多蔬菜和茶葉等，在多數食物都可以自給自足

的狀況下，與朋友合作互助投入農業生產中。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農民 A、B 是二、三重埔附近少數自家擁有烘穀機、碾米機等中、大型農機具的農民，掌握這些農業生產資材也讓他們更能掌握自己的農產品質與技術，這與獲得冠軍米殊榮有相當程度的關聯⁸。農民 C 則是年少時曾見過父執輩抗爭土地徵收，就讀土木科畢業後投入營造、景觀工程事業，對一些行政程序、法律使用都有一定的了解，對地方政治人物也都相對熟悉，再加上他年輕時又喜歡讀「孫子兵法」，因此後來在抗爭的運作上累積很多的經驗和想法，應對地方政府也自有一套策略。

從上述的田野狀態和農民經歷可看出，雖然重點仍是關心農業、農村、農民，但是現在這些概念的界線似乎不再如此壁壘分明了。「農業」從過去到現在，除了是一種生計方式、職業可能和生活方式外，也逐漸成為一種涵蓋所有相關內容的抽象概念。與農業發展、農村或鄉村發展相關的討論特別多，但是在政府和民間整理出「農業發展」的定調之前，本研究暫且不（或尚無法）詳細區隔「農業」、「農村」、「農民」這些字詞，也不只是看「農業」的「產業面」或「職業面」，只能說筆者認為與「農業」相關的人地事物，都必定會受到「農」的特殊性影響，也就是第五章第一節中所說的「要素」，這些「要素」在往後的反土徵運動中不時可見其蹤影，證明「轉化」後的運動確實包含了農民這一部份的要素。

⁸ 由於目前台灣農民每戶擁有的土地面積不大，因此耕種稻米的量並不大。而購買烘穀機、碾米機等中大型農機具所費不貲，一般農民會將生產的稻米收割後直接以「濕穀」賣給盤商或米廠，雖然價格比較不好，但是處理上比較方便。另有少數農民會將自己的「濕穀」送到民營的米廠進行烘乾和碾製的程序，再賣給盤商、農會或自行販售，但是在烘乾和碾製的過程中就無法自己看顧稻米烘製的品質。而農民 A、農民 B 烘乾和碾製的過程都是自家處理看顧，可以自己控管品質。另，有些鄰近的農民也會把米送到農民 A、B 家，藉機器來烘、碾自家種的稻米。如農民 C 家的稻米是送到農民 B 家去烘碾，農民 A 叔叔種的米也都是農民 A 代為處理。

第四章 新圈地運動—竹東反土徵網絡的形成與捲入

4.1 傳統土地抗爭背景與網絡的形成

竹東鎮二、三重埔地區位於新竹科學園區旁城鄉交會處，正可顯現出台灣農村在都市擴張階段所普遍面臨到的典型發展矛盾。早在三十年前（1981年）就因新竹科學園區三期用地的擴張而面臨被徵收的命運，當時即引起在地居民的起身抗爭，甚至發動千人圍科學園區，徵收案也因此持續拖延：

第一次啟動，包括竹東鎮外五里、包括新竹縣寶山鄉的科學園區三期，然後民國 78 年的時候他要啟動徵收，我們在民國 79 年發動一千多人去圍科學園區，是大型的抗爭，整個科學園區主要的通路、大門都被圍了，在 25 分鐘內，所有能夠開的車—不管是農耕車、搬運車、摩托車、卡車、轎車，全部去圍科學園區了……（農民 C）

新竹科學園區第三期徵收範圍內的地主兩百多人，指政府違法徵收農牧地，又傳有弊情，昨天一大早封鎖科學園區大門，造成新竹是主要聯外道路光復路交通癱瘓，現場情勢緊張；後經協調，抗爭的地主撤離光復路，前往園區內談判，達成偵辦舞弊疑案、重新檢討徵收範圍等四點決議，抗爭行動到下午二時結束。【1989-08-29/聯合報/04 版/焦點新聞】

由於當地徵收區居民抗爭激烈，所以不少次都傳出放棄徵收的消息，綜合當時之報導，反對意見主要有：一、當地土地為竹東精華地段，徵收不利於竹東未來的發展，也對地主不公平；二、秉持著農地農用的精神，二、三重埔的農民堅決反對土地被徵收；三、徵收過程的程序問題讓地主沒有受到保障；四、疑似圖利特定人士並涉及弊案等。但是地方政治人物和贊成民眾的也不願意就此放棄開

發案，因此協調拖延數年之久：

范縣長和鄭議長是在昨天下午趕往國科會跟夏主委洽談，希望能留住科學園區在新竹縣繼續開發，可是夏主委指出，國科會前後一共收到五、六百名業主聯名反對徵地的陳情書，面對那麼多人的反對如果強制徵收勢必引起很大的抗爭，其次農牧用地編定問題也沒有處理好，加上徵收價格太不符合經濟效益，更何況業主要求的中興路邊土地不徵收、頭重九點八公頃保留，管理局根本無法接受，所以只好就此打住。【1990-07-19/經濟日報/18 版/地方綜合經濟（基隆~台北~苗栗）】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新竹縣部分土地徵收工作延宕近十八年，因徵收方式無法達成協議，「區段徵收」的修法工作又無法配合下，行政院國科會已決定放棄，今天與新竹縣長范振宗、議長黃煥吉及多位立法委員開會後，將正式宣布。【1995-03-06/聯合報/06 版/綜合】

2000年時，新竹科學園區終因經費不足而放棄二重埔地區的土地徵收；2002年，時任新竹縣長鄭永金再次承諾推動竹科縣三期徵收計畫：

新竹縣長鄭永金為實現競選時的首要政見，秉持著造福鄉親，不做桑梓罪人的強烈使命感，積極推動新竹科學園區縣三期開發、璞玉計畫二大建設；不僅要創造 3.5 萬至 5 萬個工作機會，更要為科技人營造良好的生活機能。有客家硬頸精神的鄭永金信心滿滿表示，要將新竹縣打造成台灣最具競爭力的地區。【2002-08-29/經濟日報/4 版/綜合新聞】

2000 年時，新竹科學園區終因經費不足而放棄二重埔地區的土地徵收；2005 年，縣府第一次外包給榮九營造，榮九負責人捲款逃逸，以倒閉坐收。然時至 2006 年，新竹縣政府以 BOT（Build, Operate, Transfer：由民間企業協助出資興建，營

運一段時間後再將所有權轉移給政府)的形式解決資金問題，由廣昌資產管理公司得標後，當地的土地徵收計畫再度啟動(台灣農村陣線，2009)。

儘管民國 89 年竹科管理局具文告知新竹縣政府一決議放棄徵收方案、也無繼續以徵收作為高科技產業使用計畫，六年後(民國 95 年)新任縣長鄭永金仍執意要完成徵收，並將名目從科學園區用地變更為都市計畫，二、三重埔地區的徵收案屬於「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一新竹縣轄部分」，總共使用土地 411 公頃，實際徵收區域包含頭重里、二重里、三重里與柯湖里。隔年民國 96 年 1 月多位二重埔居民正式組成「新竹竹東二重地主權益自救會」，當時三重埔居民尚未被納入正式的反徵收組織動員之中、是由二重埔主掌歷次的集體行動：包括出席公聽會、臨時抗爭等。

由於過去父執輩的抗爭信念仍記憶猶新，農民 C 在徵收重新啟動後，迅速地組織抱持相同立場的當地農民一同對抗徵收，也因為 2006 年的抗爭是由二重埔自救會所發起，此徵收案才逐漸受到外來的關注，該區的徵收案多以「二重埔」來通稱(台灣農村陣線，2009)。「新竹竹東二重地主權益自救會」成立後，住在三重埔的農民 B 透過客家電視台「村民大會」的節目，目睹農民 C 代表自救會立場堅持反對土地徵收，進而連絡上農民 C，表達長期在三重埔務農的他、希望得以一起加入反對土地徵收的行列。在 B 的既有人際網絡介紹下，C 也進一步認識在三重埔務農、幾年後獲選全國十大經典好米得主的青年農民 A。雖 C 原本希望將徵收自救會的地主擴及更大的範圍，但經過多次的地方拜訪後發現，同樣被劃入徵收範圍的竹東鎮頭重里、柯湖里，被徵收地地主多是外來買地的投資客，而二重里、三重里的地主多為久居此地的居民、估計有 90%是有實際在務農的農民，而為了在「比例原則」上與政府相抗衡，自救會的名稱最終決定以「二、三重埔」為名，並不涵蓋同在徵收區內的頭重里和柯湖里。

2008 年底，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一讀通過「農村再生條例」，各界開始關注此一對農村走向影響極大的草案。在新竹工作的工程師 D 在「小地方新聞網」上發表

了一篇內容為「鋪設知識入鄉道路，讓台灣農村不再只做為都市的殖民屬地而存在」之文章。此一篇的發佈讓 D 與屆時正在籌組台灣農村陣線的幾個夥伴在網路上展開討論，隔年一月 D 參加了一場在淡水召開的農村再生條例說明會，在那邊初次與未來台灣農村陣線的成員見面，並在未來成為農陣成員之一。

D 參加完淡水的聚會回到新竹，不久後在報紙上看到二、三重埔的徵收案，D 上網查了查徵收的地點，發現那一塊地正好在他家陽台的正對面，直線距離可能不到兩百公尺。很多人都還沒有注意到竹東的徵收案，苗栗灣寶的徵收案比較廣為人知，因為徵收地點就在附近不遠的地方但卻十分不熟悉，引起 D 的興趣。D 把竹東徵收案的訊息傳到農陣網絡中，自己便騎機車到徵收範圍內看看，進到中興路另一側的看到大片農田，對於科學園區旁竟然還有這麼大片的農作區感到十分驚訝。因為當地反徵收農民曾主動跟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連絡過，於是 D 從當時在 OURs 工作的農陣成員 H 手上取得二重埔農民 C 和農民 G 的電話，成功聯絡上 G 之後，發現農民 C 與農民 G 本來都是二重埔反徵收自救會內的核心人物，但是後來因為路線上的歧異而分道揚鑣。農民 C 認為政府要徵收農民的土地就是於憲法不合，所以完全不願意被徵收，要帶領自救會抗爭到底；農民 G 則擔心，都抗爭幾十年了，再不接受縣政府提出的其他條件這麼抗爭下去，若徵收案執行後恐會失去全部的土地，因此轉為在既有的徵收制度下與縣政府協商出「客家休閒農業專區」的保留。

D 與農民 G 接觸後，大致了解二、三重埔徵收案的來龍去脈，然而，農民 C 與農民 G 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張，所以農民 C 這邊一開始對農陣成員 D 也是敬而遠之，甚至因為一些事件誤會 D 是「縣政府派來的」。農民 C 與農陣成員 D 關係的轉換，是在 2009 年中一次縣政府舉辦的徵收細部計畫案的說明會上。地方說明會中正是地方派系角力的場域，現場衝突不斷，並有暴力衝突發生：

新竹縣政府辦理擬定竹東鎮（工研院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昨天在二重國小舉辦說明會，支持和反對土地徵收者各拉布條引發衝突，互拿起現場塑膠

起當武器互擲，警方趕緊壓制衝突，不過仍有人掛彩，其中一人頭部流血，送一縫了三針無大礙。…支持徵收的地主主張加速發展，提高國家競爭力，反對者認為假藉公權力做強盜行為，縣府濫權，有老農民哽咽地說「萬一老家被徵收，連終老的地方都沒了」。**【2009-07-02/聯合報/B2 版/竹苗綜合新聞】**

農陣成員 D 在會中舉手發言，認為竹東當地的農業狀況根本不應開發，縣政府認為的文化保留也都只是保留屍體，根本不尊重當地文化等等。因為這一席發言，會後農民 C 主動上前跟 D 握手，了解 D 並非「縣政府派來的」，後來彼此的互動才逐漸增加，也會邀請 D 去參加自救會的秘密會議。地方說明會後不久，D 因為參加農陣 2009 年所舉辦的「夏耘農村草根訪調營隊」，與幾位朋友進入二、三重埔，以土地徵收為主題進行農村訪調而認識農民 A 和 B，也將竹東土地徵收的情況持續帶回台灣農村陣線的討論當中。

我剛開始接觸農陣完全沒有抱持任何想法，我也不太了解農陣在幹嘛，那是另一個農民介紹的。他就說農陣是很愛護土地的，因為那個時候我的做法就是堅持不用農藥，對有機也蠻崇拜的，某次開會他就約我去，去了才認識台灣農村陣線成員 D，所以那個時候也不是因為想保護土地才認識農陣的。加入自救會是後來農民 B 跟我說的才知道有自救會，這些自救會的人很多我本來就認識，但是他們都沒有講自救會的事，參加自救會之後才慢慢知道，原來農地不是政府要徵收就要給它徵收的，以前就會覺得政府要，我們也沒轍，現在才知道原來我們可以保護自己的土地。（農民 A）

不過，D 先熟識的是農民 G，為何在往後卻更積極連結農民 C 與農陣的網絡呢？

一開始我嘗試 G 和（在 OURs 工作的）H 拉在一起，但是 G 只想保留他家附近的土地，但 C 是想保留（整個徵收區內）全部，那我的立場當然也是想要保

留全部，所以最後就從農民 C 這邊切入，之後在（2010 年）六月初我就跟 C 一起籌畫聯合自救會。（台灣農村陣線成員 D）

農陣後續在 2010 年初於台北土城舉辦一土地徵收相關的討論會，四月在立法院召開相關記者會，皆與 C 有所互動。之後農民 C 透過農民 A 表示要跟 D 聊聊徵收的狀況，D 當時跟農民 C 談到兩件事：

一是，必須要把外面的資源引進來，二、三重埔的抗爭不能再自己搞，這樣無法達到擴大的效果。二是，必須讓在地跟外界合作一些市集或是健走之類軟性的活動，把外界的人拉到徵收現場來關心。（台灣農村陣線成員 D）



為了讓二、三重埔的農民可以安心的與農陣合作，D 準備了一個簡報，正式跟自救會的農民介紹農陣是怎樣的團體，讓他們可以安心，並表示在地抗爭要做的就是將資源引進來，農陣很願意協助。D 前後向自救會農民做了兩次的簡報，之後農民 C 與農陣互動的頻率逐漸增加，而在與農陣密切合作的學者、學生社團幾次造訪二、三重埔了解徵收現況後，以 C 為主的自救會網絡和農陣便互相確認彼此在反徵收行動上的接近立場，雙邊逐漸形成穩定的連結。

2010 年 6 月「大埔事件」爆發，土地徵收情事引起越來越多民眾的關注；事實上，在大埔事件發生前的一年間，台灣農村陣線已陸續跟幾個同樣面臨土地徵收危機的地方自救會建立網絡，並進入各個地方脈絡、協助處理徵收問題，同時期除了二、三重埔反徵收自救會外，也包含「竹南大埔自救會」，也增進了這幾個反徵收自救會間的初步了解與交流。而各個地區自救會間的合作，進而喊出「一方有難，八方來援」的口號，可以說是從 2010 年 6 月 19 號開始。當時大埔事件已經發生，大埔當地仍持續受到怪手與警力的騷擾，當天早上剛好竹東徵收案在二重國小也有說明會，縣政府動用三台警備車的鎮暴警察，加上鄉民共一千多人一起開會，並想趁著警力優勢強行通過一些徵收細節。對二、三重埔反徵收

自救會來說，說明會中受了新竹縣政府的氣無處可宣洩，恰好當天早上與竹南大埔自救會會長聯絡上，於是在開完會後臨時決定動員兩台遊覽車去開記者會，聲援被毀田的大埔：

最早聲援大埔的就是我們，最有歷練的也是我們，因為我們有大型抗爭的經驗。那時候（三十年前抗爭）因為有省議員、縣議員和律師，所以較有保障。我們去支援大埔之後呢，因為大埔人少，法源上他們比較不懂，保護土地的聲音也比較少。所以聲援的下午，我們就喊出「一方有難，八方來援」，其他幾個自救會也有派幾個代表來參加，大家就覺得土地徵收的問題大家一定要串連起來。所以後來過幾天之後大家（其他反徵收自救會的代表）就在我家開會，十天之後我們就上凱道。（農民C）

「大埔事件」對各地反徵收的行動有兩個重要影響：一、目睹了「徵收惡法」下農民頓失保障的慘況，各地反徵收組織成員變得更為著急，深怕自己家族的田地會變成下一個目標，因而在反徵收行動上變得更積極；二、怪手強行挖田，引起非常大的社會輿論壓力，恰好匯集成一股對政府單位施壓的社會氛圍，因此各地反徵收農民和相關學者、非政府組織都認為應該要在短時間內發起大型的社會活動，以將台灣土地浮濫徵收的現況正式提上檯面，因此在 2010 年 7 月 17 日一同發起夜宿凱道的活動，當天除了各地自救會齊聚一堂、說明各自的徵收狀況外，也有許多台北的民眾、學生和專家學者到場聲援。夜宿凱道行動由於農民自發的參與獲得不小的迴響，也引起媒體很大的關注，而在 717 之前台灣農村陣線成員 E 即建議除了台灣農村陣線外，不同地區的反徵收農民應該要形成一個互動更緊密、以農民為主要成員的團體，農民之間才有平台可以共商、應對未來的土地徵收，產生團結的力量。因此各個反徵收自救會代表在 717 前於農民 C 家聚會討論組織農民的事宜，並於 717 行動之後組成名為「捍衛農鄉聯盟」的農民組織，不同地區反徵收農民互動變得更頻繁。在組織名字上從受害意涵明顯、保護自我團體利

益的「反徵收自救會」到包。含守護農業價值的「捍衛農鄉聯盟」，農民在運動中的自我定位也悄悄有了轉變。因為農民 C 同時也被大家推舉為「捍衛農鄉聯盟」的會長，因此國內其他各地區的徵收程序中所召開的說明會或地方聲明記者會等，也常見以 C 為首的二、三重埔自救會成員聲援的身影。

2010 年 11 月 12 日，台灣農村陣線與農鄉捍衛聯盟一同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公布民間版土地徵收條例，記者會結束後，各徵收區農民代表與農陣代表齊至行政院，面會時任吳敦義院長與內政部江宜樺部長，但並未獲得具體承諾。11 月 14 日下午，各地反徵收自救會和聲援團體聚集在高雄美濃，一起將熟成的凱稻⁹割出「土地正義」四個大字，證明 717 行動中台灣守護農村的力量並非偶然，且民間團體在承諾的 120 天內已提出民間版本的「土地徵收條例」，官方版本卻遲遲未見蹤影，眾人呼籲政府必須儘早回應農民的訴求，否則將會在次上街頭。

2010 年 8 月底開始，網路上開始流傳一篇名為「十三年後我們吃什麼？」的文章，作者為時任清大教授彭明輝，他以多年蒐集到的資料為證據，扣連國際間石油、能源、糧食危機與台灣的關係，說明台灣糧食自給率的重要性，並強調未來「即使有錢也買不到糧食」、批判台灣政府不諳國際間最新的發展趨勢，相關內容於隔年的 4 月集結為「糧食危機關鍵報告：台灣觀察」一書。2011 年 2 月 17 日，行政院院長吳敦義於行政院會聽取農委會報告「推動在地消費，提振國產米食」計畫後表示，應將「糧食安全」提升至「國安層級」，且糧食的供應與儲存不能過度仰賴進口；然而當時「糧食安全」的相關討論在台灣仍屬小眾，我國實際可能面臨的問題對於大眾來說尚不明確。該年 6 月底，恰逢反徵收聯合自救會「捍衛農鄉聯盟」舉辦「共識營」，多個反徵收自救會幹部齊聚討論後續組織狀況，當天即邀請彭明輝至現場，針對全球石油危機、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的關聯進行專題演講。講座結束後，在場農民一致認為跟糧食安全相關的論述非常有力，替大家

⁹ 2010 年的 717 夜宿凱稻行動隔天早晨，眾人將秧苗鋪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宣示在大埔怪手挖填之後，民間團體「把田種回去」的意志，並也以這批「凱稻」的 120 日的生長期為限，要求政府：一、立即停止政商勾結的圈地惡行；二、修改土地徵收條例相關法律；三、召開全國土地與農業會議。行動結束之後，這批凱稻分別被送往高雄美濃和彰化溪州種作。

釐清、連結了許多分散的想法，並提議會後各個自救會分別邀請彭去演講、分享，讓各地的反徵收農民往後在應對徵收問題時，可以建構出更完整、清楚的論述。

由於政府持續沒有正面回應民間訴求，各地徵收惡況持續惡化，於是在 2011 年 7 月 16 日捍衛農鄉聯盟與台灣農村陣線再次發起「716 農民重返凱道夜宿行動¹⁰」，並提出「台灣永續未來關鍵十問」，再次獲得廣大群眾的迴響支持。12 月 13 日立法院不顧民間徹夜抗議，強行通過爭議性極高的<<土地徵收條例>>修正草案，此官方提出的修改版本並沒有回應民間修法的精神，但是卻挪用民間喊出的「土地正義」、「居住正義」等口號，在總統大選前呈現出政府回應民間要求的假象。然而，民間從大埔事件之後開始急速湧現的修法能量，因為官方版本的修改通過而降地，於是以修改法條為手段的反土地徵收訴求，在這個時候也暫時告一段落。



¹⁰ 第二年重返凱道的三大行動訴求為：一、立即修正土地徵收條例，反對政商與農搶地；二、要水資源分配正義，反對政商與農搶水；三、還我糧食自主安全，反對忽視台灣農業。

4.2 稻米品質提升背景與網絡的形成

稻米品質提升雖然與農民個人選擇有關，但是決定性的因素還是在於台灣整個大環境的政策動向。因為政策涵蓋的面向與影響的層面最廣，因此長期以來農民的對務農的想法，或者也可以說「農業發展」，都隨著整個政策的變動而轉變。蔡培慧（2009）回顧了台灣戰後至今的農業政策，將每個階段的政策內涵劃分為五個時期：一、恢復生產、土地改革（1945-1952），此階段的農業政策重點在於儘速恢復生產、增加糧食，以支持大量的移民人口和戰備存糧所需，而為了治理上的考量，也進行土地改革。二、農業擴張、以農養工（1953-1968），農業部門以農產品增產、勞動力外移、累積國家資本（稻米外銷創匯）和作為輕工業產品的消費市場等四項功能，促進台灣經濟發展。三、保價收購、提高所得（1969-1981），由於長期以農養工，抑制糧價的政策，讓台灣農民的平均所得低於一般國民，因此農業政策開始轉向提高農業生產、開發外銷市場，健全產銷效率已增加農業利潤、提高農民所得。四、農業結構調整（1982-1991），台灣政府受到國際談判的壓力被迫要開放台灣農產品市場，因為台灣小農生產的特性無法與外來農產競爭，因此政府開始調整台灣整體的農業結構，此階段農業政策由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糧食生產由主食轉作雜糧，長期被壓抑的農民也透過農民運動爭取政策上如農民保險等福利保障。五、農業自由化階段（1992-2005），台灣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而預做準備，以〈農業協定〉的規範架構展開大規模的離農離牧計畫，大規模調整台灣農業經營方向，此時政策以農地釋出、農田休耕、大幅開放市場為主軸。

從這五個階段可以看出不同階段的台灣農業發展走向，也解釋台灣農作如何由重「量」轉往重「質」的歷史背景。而農會是從日治時期出現的半官方單位，國民政府來台將農會改組後，農會就成為在農村中執行、傳達政府政策、與農民直接接觸的第一線組織，也因此，政府在農業上的政策轉向，通常也都可以從農

會的活動中看出，地方性農會所舉辦的冠軍米和良質米比賽即是面臨國外農產品競爭後輔導、促使農民生產由「量」轉「質」的最好例子。為加強農民生產稻米之品質，農糧署自民國 84 年第一期稻作開始輔導地區農會辦理「鄉鎮級」品質競賽；民國 88 年擴大辦理「縣級」農會之稻米品質競賽，至民國 91 年有花東縱谷跨縣市之「區級」競賽。為擴大稻米品質競賽之成效，在民國 93 年籌辦了「第一屆全國稻米品質競賽活動」，目標在於透過公正、公開之各項評鑑過程，對所評選出之各地冠軍米，配合媒體宣傳，舉辦競賣會活動，以提升台灣國產稻米高品質、高價格的形象，評選的標準則從田間初審、取樣、樣品品質分析至食味評鑑。民國 96 年開始，此全國性的稻米品質競賽換名為「全國十大經典好米選拔」繼續進行，因此「全國十大經典好米」成為往後全國性稻米殊榮的代名詞。而地區農會的稻米競賽等於是「全國十大經典好米」的地方預賽，只有地區農會舉辦的稻米競賽年度冠軍才有資格競爭全國十大經典好米的殊榮。而近幾年在竹東冠軍米比賽表現最突出的兩位三重埔農民，農民 A 與農民 B 又是如何走入追求稻米品質的這條路呢？

農民 B 的爸爸過去就在三重埔務農，而農民 B 從小就協助爸爸農事。民國 50 幾年 B 開始養雞，至民國 70 幾年養豬業大起，B 也轉為養豬，直到 80 年代末期政府開始離牧政策，民國 90 年環保局為了整治河川、避免畜牧排泄物汙染，徵收當地的養豬用地，農民 B 遂由牧轉農，開始他務農的生命歷程。

農民 A 則是成年後離開三重埔，在台灣傳統產業十分風行的年代往來於各地經營紡織生意，隨著台灣紡織業後期慢慢沒落，A 開始將他的部份重心轉移回三重埔的農務上，約莫十年前才決定回到三重埔做個專業農民。農民 B 家與 A 家並不遠，是農民 A 父執輩就認識的鄰居；在傳統的種稻知識／地方智慧上，三重埔農民本來就存在閒談間互相分享、交流的習慣，由於 A 中年回農，在當地算是相對年輕的農民，身為在地人的他附近鄉里親友的關係是緊密的，又喜歡交朋友，

與農改場和農會關係都好，因此也常常成為當地老農間的資訊來源。

竹東鎮農會指導員 F，高職畜牧科畢業，當年進入農會時主要負責的是毛豬共同運銷的業務，在二十年前拜訪豬農的過程中結識了農民 B，後來農民 B 由牧轉農，他也推薦 B 改種稻米和其他雜糧。F 與 A 是在某次的機緣中，他人介紹認識的，因為 F 與 A 年齡相近，彼此很聊得來，便很快的熟悉起來。F 做為在地方上的農業技術推廣者，在工作情感和職責上都必須盡可能與地方農民建立緊密的關係、輔導他們有更好的經營成績；另一方面，F 也帶著政府補助的資源和知識進入農村，與 F 熟悉的農民們相對上能夠獲得更多的資訊和資源。國人的飲食習慣逐漸轉換之後，台灣米食消耗量大量萎縮，但在台灣稻米生產仍屬大宗，因此如何用各種不同方式推廣米食當然也成為竹東農會推廣股的重要業務。

竹東地區農會推廣股表示，光復初期國人的米食消耗量約為每人每年二百公斤，到現在僅剩 50 公斤，這種演變並不是很好，因為稻米仍是最適合國人體質且營養均衡的天然食品，富含蛋白質又不含膽固醇，所以如何加以推廣成為農政單位關切的重點。...以新竹縣為例，農作物也是以稻米為主，過去使用純米加工的米粉，在全台各地辦理的促銷活動中相當成功，因此農會開始策劃米食加工可能性，經過促銷試吃反應不錯，才決定大力推廣，這也是客家美食中心成立的原由。【1994-01-26/經濟日報/15 版/商業流通】

當稻米品質競賽成為促銷良質米的主要舞台時，農民 B 與 A 接續成為地方投入稻米品質競賽的佼佼者，除了個人的既有生產條件外，是否與農會指導員 F 有甚麼關連呢？農會從過去就是農民接受農業訊息的主要來源，但是不代表這種訊息的散布是很廣泛、平均的，過去的網路媒體不發達，因此農民的訊息來源是十分不足的，多以鄰尾巷頭口耳相傳的消息為主。

在我開始比賽竹東冠軍米之前，大概都是竹東其他地方的人在比，二、三重埔這邊的人都不知道有這個比賽，農會那邊應該有跟農改場說，但是總之不

知道什麼原因以前我們都沒有得到消息，所以有在參加比賽拿冠軍的都是竹東其他地方的農民…。(農民 A)

而地方上有那麼多的農民，哪些農民會受到農會輔導員的重點輔導、投入稻米品質競賽中，並進而在比賽中脫穎而出，勢必也參合了許多不同的因素在其中。

站在輔導的角度上，像他們這種比較願意接受新東西、比較積極的農民，尤其是先前經商的、或公務員退休的，就會變成我們在輔導上的重點對象阿…我會花很多時間跟他們討論該怎麼種比較好…我都會跟 A 說，他田的範圍不夠大，他就是要做精(精緻)，賣出去的商品就是要有一定的品質，不可以隨便…我都跟我們的農友說：要有競爭和被競爭的性格…。(農會指導員 F)

除了 F 的輔導和資源引介外，農民 A 與農民 B 本身的人格特質也是重要的關鍵。雖然二、三重埔仍有繼續務農的農戶很多，但是農民年紀多已屆高齡，務農所得只能當作補貼，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還仰賴子女在外工作的薪水所得，因此老農幾乎都是採用過去熟悉的慣行農法，稻米收割時就直接賣給大盤(糧商)或販仔，減少後續產銷的處理，自己反而再去外面的商店買米吃。而 A 與 B 是少數在二、三重埔會自己思索如何進行稻米銷售的專業農，透過 F 的資訊轉介，他們從農改場和農會的課程中吸收了較新的農業知識，他們也在各種不同的耕種經驗中體認到慣行農法對土地和身體可能的傷害後，便積極實踐在自己的農作上，改用接近無毒、友善環境¹¹的種植方式，竟反而更符合現在消費者的喜好。稻米品質競賽的標準中並沒有要求稻米要「無毒」或「友善環境」，政府對於稻米品質的標準是以市場競爭力為主，所以在藥檢上只要求要到「合理用藥」、「農

¹¹ 自第一次綠色革命開始，農民開始被教導使用農藥、化肥與各種農機具來大量增加農作物的產量和生產的效率，也是我們今天所稱的「慣行農法」。時至今日，各界開始反思「慣行農法」是否真的對土地、農民和消費者都造成太多的傷害，因此開始出現對應「慣行農法」的各種不同的農法，這些如雨後春筍般新生的農法各有不同的做法、理念和標準，最常聽到的「有機」的最普遍概念是不使用任何化學製成的農藥與肥料，而「無毒」、「友善土地」的農法則仍沒有統一的標準，竹東農民 A 與農民 B 的「無毒」是以不使用化學農藥為主，但仍會酌量使用化學肥料。

藥零檢出」，但是農民更進一步自發性地涵蓋理念的「無毒」耕種方式在稻米品質上累加了一層價值，讓他們在平時就有機會經營自己的消費客群。

反正一定要下功夫，就順便參加比賽。做哪一行就要研究哪一行，一定要有信心…第一年都沒有得名，前年（2009）開始得了第一名，起先比賽沒有那麼激烈，大家沒有那麼努力認真，現在比賽比較激烈，有比賽就有進步…現在米還是賺不到甚麼錢，（種無毒）就是「做健康」，不會吃到別人有施藥的米，比較注重健康…我做事情都是有頭有尾，一定要成功就對了，做不好就改品種、研究技術…參加比賽之後比較累，但是賺的錢也沒有變很多，只有多賺一點獎金，但是也差不多當多的人工費…自己賣米的話，一等米二等米比較好賣，這樣也比較有面子。（農民B）

我從以前做生意的時候就是這樣，要做就做第一，不要做第二，因為大家只看的到第一，之後（對大眾來說）都沒有意義…為什麼要用比較健康的方式種喔，老實說我也不知道耶，我一開始決定要回來當專業農的時候，還沒去農改場上課，就自己覺得應該要這樣做了…。剛開始比賽像是在陪農會玩啦，後來也是一個巴掌拍不響，F也是鼓勵我多花一點時間幫新竹縣拿獎項…事實上要比賽是非常累的，工多非常多，把工算進去的我還賠錢咧…我做事情都是比別人早，別人不敢做的事我會先做，這就是我的個性。（農民A）

農民A和B對於經營農業產銷、以農業營生等都有較多的思考，這樣敢嚐試、「要做就要做好」的人格特質、與農會的互動和隨著農業政策轉向而生的稻米品質競賽，交錯成反圈地運動可以被外界看見一大因素。

4.3 二〇一〇年後反新圈地運動之網絡

4.3.1 網絡連結與形成

原本在二、三重埔的農民各自帶著過去土地徵收和稻米品質提升的網絡，然而二〇一〇年之後，因為原本並非反對土地徵收中心人物的農民 A 和農民 B 與農民 C 取得聯繫，兩人皆加入「二、三重埔地主權益自救會」；且台灣農村陣線因為察覺到台灣土地徵收的浮濫狀況，與當地的農民開始著手連結，帶進更多訊息和人力；大埔事件之後讓不同地方的徵收自救會積極地串連在一起，因此原本傳統土地抗爭的網絡和稻米品質提升的網絡匯流，成為一個抵抗新圈地運動的網絡，而這個網絡則包含了更多面向的元素在內。

若把傳統土地抗爭和稻米品質提升的網絡拉開來看，會發現當地反對徵收的農民在參與稻米品質競賽的動機，一開始並非抗爭的目的，而主要是基於農會指導員 F 將其作為業務之一、積極宣導，鼓勵幾位在農務上較積極的農民參加，形成人情的壓力；冠軍米比賽開始舉辦的頭幾年，二、三重埔反徵收農民與新竹縣政府的對抗也尚未到達最激烈的階段，竹東冠軍米比賽與抗爭之間並沒有產生太多連結。農會是耕作者取得技術、補助資訊的主要來源，所以當地有在務農的居民通常都與農事指導員維持一定的交情和連繫，且部分農民仍靠銷售稻米營生，若參加比賽獲得好成績也對自加稻米的銷售有所幫助。因此當農會開始推廣冠軍米比賽時，地方農民多抱著「參加看看也沒壞處」、「就算沒得前三名，名次不要太差還有獎金可以拿」的心情參賽。地方上的農民普遍對於「稻米的品質」沒有太深的概念，雖然不乏同樣種稻的農民，但是認真想要參加比賽的人並不多，所以一開始參加比賽的競爭並不激烈。

2009 年開始，自救會成員農民 B 獲得竹東地區冠軍米比賽的第一名，農民 A 獲得第三名，但當時土地徵收一題仍未提上檯面，相關的新聞報導並沒有提到農民 B 與 A 的土地恐被徵收一事，只是簡單描述其生產秘訣帶過。

贏得第一名的農民 B 分享經驗說，不用農藥又想維持好看的稻米外觀，就得出穗到收割的這一個月內，密集用鞭炮趕鳥，這樣可以大幅減少稻米的被害率，讓米粒外觀保持完美。【2009-8-13/自由時報/北部新聞】（底線處為筆者所替換之代號）

然而在生產的面向上，也因為關心土徵的行動者進入當地，而產生更多的效應。農陣成員 D 因為關心農業的緣故開始關注竹東徵收議題，同時他也對農業的農法和整體發展十分有興趣。而恰巧 D 工作的地方成立了「自然農耕社」，對農業實作有學習企圖的 D 並加入的「自然農耕社」，社團成員們找到一塊可以讓他們耕作的土地，但是他們沒有農機具，也對耕種沒有概念、不知道該怎麼重，於是 D 透過友人的介紹認識了農民 A，便邀請 A 來跟社團的成員聊聊天，社團成員開始有點概念後並開始嘗試耕作。之後，農民 A 發現自家旁邊有一小塊農地在等待出租，並詢問 D 是否有意願租下來，因為 A 的人情網絡可以取得非常便宜的租金，離 A 的農田非常近也可以有進一步合作的機會，於是 D 二話不說就把這塊地租了下來。在初步嘗試的農耕經營後，自然農耕社的成員對未來應該如何經營有了分歧，於是 D 決定到 A 附近的這塊田地重起爐灶，並與 A 合作，用社區支持型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的方式運作，這樣的農業經營方式對農民 A 來說也是新的概念，因為 D 對不同的農法和經營方式十分有興趣，常常會從書本中獲得些新知識，或與其他農法的專家交流，A 也在兩人互動合作的過程中耳濡目染，更加深了自己對於農業的知識與經營農業的見解。

另外，D 進入二、三重埔當地的網絡也帶來了其他的效應。2009 年的「夏耘農村草根訪調營隊」後 D 與友人進入二、三重埔進行土地徵收的初步概況訪調後，

訪調成果引起農陣和清、交大學生的關注，認為必須連結學生與在地農村的關聯，並對土地徵收不同層面的影響有更細緻的了解。於是在 2010 年夏天的「夏耘農村草根訪調營隊」，以清、交大的學生帶領組成一個新的訪調小組，再度進入二、三重埔，除了感受、體驗農村與農務外，也就生活面上了解徵收對於當地農民的影響。農民 A 在三重埔有過去蓋的紡織工廠做為擺放農機和農資材以及辦公室的空間，同時 A 也喜於交友、與新事物接觸，這些特質卻意外在相對保守的農村中創造了外來人士進入的空間。於是，在 D 的引介下訪調小組五天四夜都是住在農民 A 的工廠中，除了徵收面的訪調之外，也和 A 一起到農田裡勞動，學習與感受農人與土地互動的方式，並於事後撰寫出訪調文章¹²，讓外界對竹東當地的徵收案有多方面的思考。這幾天中農民 A 與學生大量相處、分享彼此的想法，開啟了農民 A 往後與學生青年社群大量互動、持續舉辦農事體驗活動的契機，原本就擅長使用網路媒體的學生，也讓農民 A 有更多機會被外界看到。學生訪調後不久，搭著 2010 年 717 行動的氣勢，農民 A 獲得竹東地區農會冠軍米比賽「冠軍」的殊榮，以報導稻米耕種技術和生產方式為主的稻米品質相關報導中也開始出現徵收面向的描述，但是訴求與論述仍不強烈，以農民 A 的個人狀況與建議為主：

46 歲的農民 A說，家裡 4 代都種田，他從小開始學種田，技術已經從提高產量升級到提昇水準，他之所以能種出第 1 名的米，就是走精緻化路線，想辦法讓稻穗不會過度飽滿，相對米質和營養成分都會比較高。農民 A也強調，他年年參加這項米質競賽，2008 年拿下第 2 名，2009 年第 3 名，今年終於拿到第 1 名，努力總算獲得肯定。但他也擔心，位於園區 3 期區段徵收計畫範圍內的 3 分地農田，是他花了很多心血打造的良質米基地，未來如果徵收計畫真的要執行，沒田可種的他，不知道該何去何從。他建議縣府，在辦理這次區段徵收前多聽聽農民的意見，最好規劃出一塊水源和土質都好的農業保存區，讓頭前溪流域能夠繼續保持「良質米米倉」的美名。【2010-8-11/自由

¹² 收錄於台灣農村陣線所出版的「2010 夏耘農村草根訪調文集」。

時報/北部新聞】(底線處為筆者所替換之代號)

2010年的717凱道守夜行動和1114美濃割凱道活動，都博得不少媒體的版面，對不願被徵收農地的農民和台灣農村陣線來說，眾人的串聯和團結產生了意料之外的巨大能量，因此繼續組織農民團結與培力，就成為當下反圈地運動的主要工作。另一方面，各地徵收的腳步也沒有因此減緩，反而像是被戳破的面具般，一下子各地許多面臨徵收的群眾都開始對外發聲、求援。於是在2011年初到五月之間，農陣與農盟舉辦了三、四次針對農民的法律說明、培力工作坊和共識營，找來熟悉土地徵收法條的律師、抗爭經驗豐富的自救會代表和相關的專家學者來與面臨徵收威脅的農民互動，並促發不同自救會成員間的合作討論，與土地徵收和農業間的關聯發想，希望農盟作為一個整體代表，而各個自救會做為地區抗爭的個體，都能夠及時應對當地土地徵收的抗爭衝突。農民 C 做為農盟和二、三重埔自救會的代表，當然積極參與其中。

在抗爭之餘，農民的耕作依照節氣變化繼續著。2011年農民 A 第二年獲得竹東地區農會冠軍米比賽冠軍，這在當地是十分有榮譽、「有面子」的一件事了，往常在竹東是沒有農民連續兩年拿到冠軍的，不過地方冠軍的影響力遠不及2011年一個多月後農民 A 更「意外地」獲選為全國十大經典好米冠軍得主受到的關注。自從農委會開辦「十大經典好米」選拔以來，新竹縣第一次有農民獲選全國性的稻米品質認可，從地區性的品質認證躍升為國家級的品質認可，對地方上關心和投入土地徵收議題的人來說，都是很大的轉變；外界對於竹東地區土地徵收問題的關注，似乎也從地區性拉抬到全國性的關注。在2011年竹東冠軍米成績揭曉後，地方版新聞對此僅稍有著墨：

新竹縣竹東鎮農會昨天舉行稻米評鑑，14組稻米進入決賽，競爭激烈，前三名平分差距都在0.1分內，最後由農民 A的桃園三號香米連續兩年奪冠，或3萬元獎金。…「大家良性競爭，得名就是肯定」74歲的農民 B很有風度的與

農民 A 握手致意，他說，他對稻米生長習性瞭若指掌，很開心有年輕一輩農
有接棒，不介意名次。…農民 A、農民 B 位於二重埔、三重埔的田地被縣府列
為預定徵收地，不禁感嘆，獲獎優良農田都難逃徵收命運，以後恐怕無法再
參賽了，希望政府能重視農民耕種權益。【2011-08-27/聯合報/B2 版/竹苗綜
合新聞】（底線處為筆者所替換之代號）

一個多月後，十大經典好米結果揭曉，農民 A 獲選十大經典好米一事出現第
一波報導熱潮：

獲得今年全國十大經典好米殊榮的 A 農友，縣長邱鏡淳廿三日頒獎表揚，允
諾資助折合卅萬的機具做為獎勵，但他的農田卻因園區三期的擴編，有一半
被畫為北二高匝道用地，得獎卻面臨稻田被徵收的命運，讓農民 A 感到很徬
徨。農民 A 的三甲稻田就在竹東鎮中興路二段往三角城的竹東大圳旁邊，鄰
近的稻田是 農民 B 所有。A、B 兩姓在這裡擁有六公頃良田，農民 A 是今年和
去年竹東區稻米評鑑的第一名，農民 B 則是前年的第一名。兩人去年還參加
農民 C 發起的反對園區三期土地徵收案的抗爭活動，在邱鏡淳一行前往勘查
地形時，在稻田裡拉起白布條豎起稻草人，反對稻田被徵收。【2011-09-24/
中國時報/陳權欣/竹縣報導】（底線處為筆者所替換之代號）

農民 A 今年 47 歲，三代在竹東鎮三重里一帶務農，五專學機械的他，選擇「不
務正業」，立志當快樂農夫，務農超過 20 年，專門種稻米、甘藷，之前在 3
分地稻田裡養 30 隻鴨子，鴨子會吃福壽螺和雜草，減少病蟲害，鴨子在稻田
裡活動，麻雀不敢靠近，能減少稻米損失。…竹東地區農會推廣股指導員 F
說，「帥帥農夫」富執行力，不斷學習、創新，很有實驗精神，貫徹生物共生
循環理論務農，達到尊重生命，也尊重環境理念。【2011-09-23/聯合新聞網/
王慧瑛/竹東報導】（底線處為筆者所替換之代號）

許多媒體從業人員前往竹東鎮拜訪農民 A，一方面是因為十大經典好米得主的他耕種上特別的技巧和開放的個人特質，另一方面是他同時具有面臨土地徵收的農民身分，一般來說，只要具備其中一個因素就有機會成為媒體報導的對象，現在農民 A 在雙重條件下無疑是新聞報導的好素材；這個事件也進一步為當地的反徵收行動與策略提供了新的契機、或說一個可就此「借力使力（台灣農村陣線成員 E）」的基礎。不知道該說巧合還是機緣，就在得到十大經典好米後，農民 A 決定與「上下游新聞市集網站¹³」合作，在上下游的網站平台上銷售自己的稻米，更進一步激發稻米品質與土地徵收間的堆疊作用。

「上下游新聞市集網站」於 2011 年九月開站，不同於一般的線上銷售平台或單純的網路媒體，而是結合兩者之間的特性，希望同時可以關注農業與環境議題，並將對議題的關心直接連結到消費理念上的支持進而改變長久的消費習慣，同時也可以對農民的產銷有所助益，而不是單純將農產品作為獲利的商品。「上下游新聞市集網站」的創辦人之一馮小非另一個身分是台灣農村陣線的成員，透過農陣的網絡她也開始關注到竹東當地的徵收問題，並認為具有雙重角色的農民 A 所生產的稻米，很適合在上下游的平台上推廣與販賣，這樣既是讓更多人可以了解土地徵收的議題，也可以讓種出好米的農民有更多銷售的機會，於是馮小非找上農民 A 確認理念上的默契後並開始合作，在上下游網站上協助行銷與宣傳。2011 年 11 月 4 號，上下游以「**史上最優惠的經典好米，卻是最憂愁的生產者—稻農 A**」為名的報導上線，內容詳細地說明農民 A 在土地徵收上的立場和在農業生產上的堅定態度：

「大家只知道新竹有高科技產業，卻忘記還有可以種出經典好米的優良農業生產環境，同樣也可以養活眾多人口，」農民 A 感慨地說。…在一般人的印

¹³ 上下游新聞市集網站 <http://www.newsmarket.com.tw/>。
上下游工作日誌 <http://blog.newsmarket.tw/>。

象裡，流經都會區邊緣的水圳，經常充斥惡臭與生活污水，但農民 A 引水灌溉的竹東大圳水脈，卻是難得的清澈見底。…他那 6 分多大小的農田，用第一期種水稻、第二期種地瓜的方式，輪流耕作，維持地力。為了維持這片都市綠洲的生態環境，農民 A 採用天敵防治病蟲害。種水稻時，他放養禾鴨吃福壽螺；種地瓜時，他放養鸕鶿吃惱人的蟻象。至於田裡的雜草，除了偶而用人工拔除，大多放著與作物共生。…從兼業農到專業農，農民 A 不變的是對務農的喜愛，同時將從事紡織業研發設計的精益求精態度，帶到農業。原本他習慣噴農藥殺蟲，知道化學農藥對環境與土壤造成的傷害，改以無毒栽培。為了瞭解土壤與作物的特性，經常請教農業改良場的專家、學者、農會推廣員與資深農民等。…「講什麼徵收農地做科學園區、工業區，廠房見不到幾個，反倒附近蓋了一大堆豪宅炒房地產…」農民 A 說，農業是百年大計，農地不應再被徵收，尤其現在極端氣候下頻頻發生糧食危機，農地資源越來越重要。「要把鄉村叢林變成都市叢林，很容易；要把都市叢林變回鄉村叢林，不可能！」農民 A 指著自己的紡織廠，直說很後悔當初蓋在農地上，因為現在要恢復耕作，已經不可能了。除了農地資源的喪失，農民 A 也從生活面與情感面，談反對農地徵收的理由。「更何況農民與自己長久耕作的土地早有了感情，土壤裡有什麼微生物與成份，適合種哪種農作物，早就摸得一清二楚，不是隨便換個土地就可以替代的…」農民 A 每次聽到外界用金錢角度衡量農地徵收問題，總會苦口婆心的解釋為何真正的農人不願放棄自己的土地。（底線處為筆者所替換之代號）

因為上下游的報導詳細的內容與議題衝突性，除了引起上下游平台上搶購農民 A 稻米的熱潮外，同時也激起主流媒體以農民 A 為主角的第二波關注、討論土地徵收與農業發展衝突的報導，不同面向的前因後果探析都可看見此衝突益發尖

銳，因為傳播的範圍巨增，從中也可看見相關政府單位也不得不對這個事件有所回應：

根據關心農業發展的《上下游新聞市集》第一手報導，剛榮獲今年全國十大經典好米的新竹縣竹東農會稻農 A，其位於竹東二重埔、三重埔交界的農田，因竹科三期開發案，至少有一半農地被徵收做為國道三號的二重交流道用地。也就是說，這塊經典好米產地已瀕臨死亡命運。…能夠種出十大經典好米（別忘了這是農委會主辦的官方競賽）的田地，當然是沒有任何爭議的優良農田；稻農 A 堅持友善無毒的有機耕作方式，更值得其他農友學習效仿。但是，如此豐饒的田地、這麼用心的耕作，卻將在一紙徵收命令後灰飛煙滅，官方不但自毀諾言，此情此景對於宣稱照顧農民權益的政府更是莫大諷刺。…尤有甚者，農民拒絕徵地常被冠上「反對發展」汙名，但當前工業區、科學園區閒置荒廢者比比皆是，許多新興徵收計畫往往淪為圖利財團開發，或是成為下一個浪費納稅人公帑的蚊子園區。僅以去年引發重大爭議的中科四期為例，這項專為面板大廠友達量身打造的開發案，在友達鉅額虧損後已停止進駐，當初政府硬要徵收農地又是所為何來？（底線處為筆者所替換之代號）

【2011-11-09/中國時報/何榮幸／我見我思—竹東神農無田可耕】

近年來地方政府徵收農地劃設園區與都市計畫用地，但招商情況不理想，引發輿論質疑炒地皮爭議未歇，近來傳出，10月才從14縣市、58個鄉鎮的1885位農友中勝出，新十大經典好米之一的新竹縣竹東地區農民 A，他的農地也要被徵收。…傳農民 A 為此事感受有壓力，不便對外受訪；就此農委會農糧署長李蒼郎說，有派人前往了解，確實有徵地之事發生，初步了解是新竹縣政府新推出的規劃，要徵用農地作為都市計畫用地使用，但是此案必須要送內政部都委會審查，還沒送審。…上述調查數據顯示，台灣每5屋就有1屋是空屋，卻持續發生徵農地作為都市計畫用地、蓋新屋使用，農委會對農地徵

用作為都市計畫用地的主張為何？李蒼郎表示，他相信農地徵用會愈來愈不容易。(底線處為筆者所替換之代號)【2011-11-10/中央社/楊淑閔／產十大經典好米農地亦被徵用】

農民 A 的故事在網路被轉寄、討論後，「各界關心」接踵而至，農民 A 已不願再談。…「上下游新聞市集」創辦人馮小非說，政府一直認為農地沒有價值，才不斷徵收。但自從該網站報導農民 A 的故事以來，獲得極大回響，網友不僅為他加油鼓勵，還以買米做為行動支持，希望藉此向政府彰顯農地的價值。…捍衛農鄉聯盟會長農民 C 和農民 A 同樣都是竹東二重埔農民，農民 C 說，在豪宅、科學園區的環伺下，當地農民已抗爭三十餘年，「永續務農有那麼難嗎？為什麼政府總想把農民消滅掉？」農委會是「減農委會」，根本不會站出來捍衛農民權益。…農民連續兩年夜宿凱道抗議農地被徵收，行政院每次總是承諾保留優良農地，卻口惠而實不至，台灣農村陣線成員 E 強調，農地徵收絕不是個案，這是長期忽略農村的結果；農民用土地種出農作，長期滋養每個台灣人，如果再繼續蹂躪他們，屆時不只來自農民、也會有大自然的反撲力量。(底線處為筆者所替換之代號) 【2011-11-14/自由時報/經典米農田被徵收 網友買米打氣】

幾篇報導的討論都可以看出透過媒體的批露與報導，反對土地徵收和稻米品質間的網絡已經被密切嵌合在一起，不像原本只是兩個由不同背景、不同網絡形成的兩個話題。而農政主管機關農委會也在長期的噤聲下，不得不對此事有所回應：

有關報載獲得十大經典好米之農田將被徵收，農民面臨無地可種問題。農委會表示，保護農地資源，是一貫之政策立場，涉及農地變更之土地徵收，都必須符合國家重大發展建設及公益性目的，不得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

農委會並指出，針對本案涉及之土地徵收開發案，前已行文新竹縣政府轉達農民心聲，並請縣府針對開發案涉及使用農地之必要性、合理性及無可替代性嚴格審查，且須維護周遭農業環境不容受污染，同時應加強與民眾溝通並尊重其意願，將農地變更之影響與衝擊減小至最低程度。據瞭解，本案農友 A 耕種之農地坐落於新竹縣竹東鎮都市計畫農業區範圍，如需徵收變更做非農用，亦應秉持上開原則辦理。另該會農糧署已於 11 月 9 日派員瞭解，農友 A 係於本區域內租用約 3 公頃農地耕作，經洽新竹縣政府承辦單位，該府重視農民的意見，並將從保障農民耕作權立場妥適規劃處理。農委會表示，照顧農民是農委會的核心價值，因此，除關心及瞭解農民需求，亦將持續關注該開發案之進展，並適時表達保護優良農地的基本原則及立場。（《農委會重申農地徵收應符合公益性並保障農民既有權益》第 6320 號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14 日）

然而參加地方或全國冠軍米比賽獲獎之個體情事是如何整合進一個區域性的集／群體抵抗、促成行動者網絡形構出的集體行為與認知，就有賴特定人力的組織與動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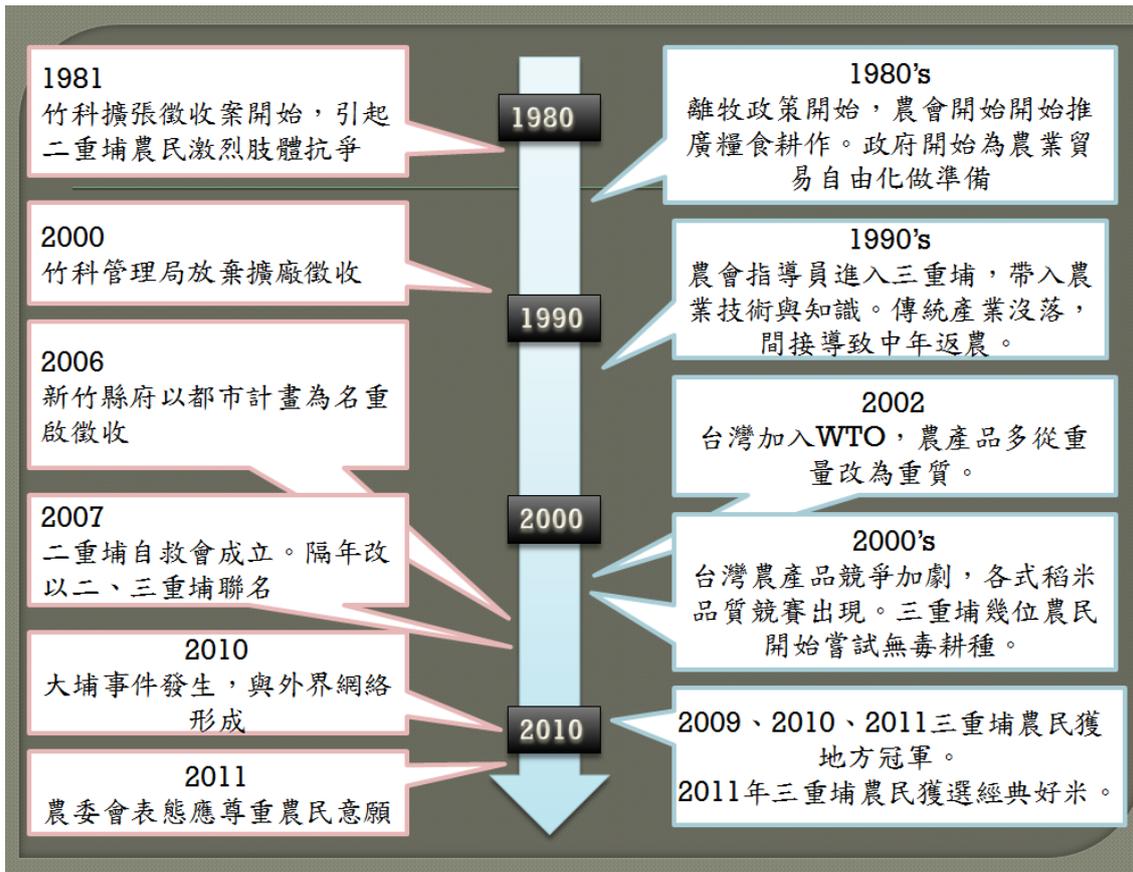
就像一個功課很好的小孩，父母越是不讓他讀下去他就越要考第一名，讓爸爸媽媽想辦法要給他讀下去！我們用比賽（結果）的籌碼跟政府、財團來說，我們就是要種好米給台灣人吃，不可以毀良田，農產品質就是我們對抗的籌碼。…雖然在非徵收區內（如竹東的軟橋地區）的也有些農民很熱中於參加冠軍米比賽，但是在徵收區內的農民想要得獎的精神會更強烈，要證明自己要保留的是優質良田，抗爭的時候也會收集大家得獎的獎狀或是相關的新聞剪報...。（農民 C）

自救會那邊就是有得獎就拿去蒐集在一起…自救會裡面有種田的多是

很多啦，但比賽是少數啦，（每個人的）理想/理念不一樣啦…有品質才有競爭，那個料才會出來，我們那時候沒有考慮自救會的問題捏，後來就是考慮自救會啦，越認真在做，因為我們有本錢跟它抗爭啊，主要現在就是要拼這個啊。（農民B）

上述訪談內容都可以顯示，稻米品質競賽的佳績並非主動地迎合反徵收論述，而是在證實當地具有良好的農業資源以作為反徵收的使力點上、被動地劃為反徵收農民網絡的工具之一，以「獎牌作盾牌」。由此，自救會更發展出新階段的反徵收邏輯：（1）良質米代表了良質的土地，是應該被保護、保存而非被剝奪的；（2）台灣無法倖免於當前的全球糧食危機，農民作為稻米的生產者是保護、餵養了台灣的人民；（3）因此，保存農地與糧食供應以達到永續發展、考量未來下一代的生活，是迫切且極其重要的；顯見糧食安全、永續發展等學術語言被轉借到抗爭的組織技術中。





圖一：傳統抗爭（左）與稻米品質提升網絡（右）大事記

4.3.2 重要節點的出現與串連

在 2010 年之後所形成的反新圈地運動之網絡，因不同行動者的互相連結，進而產生後續效果。其中，幾個重要事件形成網絡中的重要節點（nodes），包含「大埔事件」、「2010 年夏耘農村草根訪調」和「十大經典好米比賽」，都讓原本在不同脈絡下形成的事件得以迅速串連。

「大埔事件」作為揭露浮濫土地徵收現況的引爆點，讓群眾開始關注各地的土地徵收狀況並非個案，而是過去習積已久的開發主義思維造成台灣農業生產要素—農地受到不可回復性傷害，恐影響未來農業發展的重要議題。外來知識團體、學生和資源開始與徵收區內的農民接觸，也進而形成不同地區反徵收自救會間的串連，改變原本只有地區農民獨自面對土地徵收的局面。這些原本各自行動的行

動者連結之後，一來一往的互動、反思和辯論也讓抗爭的方式逐漸變得多元、豐富。

大埔事件成為年輕學子想要進一步了解農村問題的動機，也讓過去年輕人大量流失的農村因為年輕人進入「攪動」而產生新的能量，如「2010年夏耘農村草根訪調」作為此時的重要節點，打開社會大眾與農村、農民間原本各自行動的界線，學生訪調小組即成為往後農民 A 連結、接觸更多學生團體、社會大眾，並決定持續舉辦農事體驗活動的新發現和動力。

「十大經典好米比賽」起因於農業自由貿易後的品質轉向政策，卻轉變成佐證優良農地的抗爭資源，在整個網絡中也是連結許多不同參與者的重要節點。原本農民 A 就在舉辦稻米競賽的農會產銷系統中，後來在獲選十大經典好米後，和透過農陣網絡連結上、兼具媒體與產銷功能的上下游新聞市集產生連結，上下游的報導吸引了主流媒體的關注，也吸引更多原本較土地徵收議題，更重視農產品品質和理念的支持群眾，透過購買農產品的方式來支持反對土地徵收的優質農民。

上述事件原先都不是為了抵抗土地徵收而刻意創造出來，每個事件背後各別有其歷史脈絡和社會關係，形式也不同於過往直接包圍科學園區、直接產生衝突的抗爭方式，但是個別事件都同時凸顯了農業和土地的價值和重要性，因而成為反新圈地運動中的重要節點，並在後期的抗爭中匯流，成為抵抗土地徵收的網絡資源。

第五章 土地、農業價值論述的轉化

5.1 農民乘載的文化轉化要素

從上一章的網絡形成與捲入中，我們可以看到網絡的動態造成當中各個行動者有了「轉化」的契機，但是除了契機之外，實際讓「轉化」在這樣的網絡背景中成為可能的「要素」為何，即使本節著墨的重點。

採用楊弘任的「文化轉化」概念，我們可以問，在網絡中最重要的兩個群體：知識份子與農民，分別帶著怎樣的「要素」讓他們得以互相理解、認同並進一步產生集體行動。專家學者、學生等知識份子近似楊弘任田野中的「公共行動團體」，對於土地徵收議題的關係主要的是因為整體台灣農業的發展等，他們所帶入的除了個別專家因為個人成長經驗所產生對農村的情感外，莫過就是他們從書籍和國內外發展經驗所得的農業相關「論述知識」。然而當地抗爭的農民則近似楊弘任田野中的「村落傳統團體」，一開始以捍衛自我家族財產、生活方式、生活空間出發，因為長久在農村生活，雖然不一定以務農為生，但是年復一年持續的進行農業勞動，他們帶著傳承、記憶在身體裡的農業「實作知識」。而在本研究的田野中，筆者認為「土地徵收事件」同時做為跨越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重要事件：一、土地徵收的急迫性讓外來聲援團體和在地反徵收農民有的對話彼此知識形式的動機；二、土地徵收網絡的互動逐漸融合外來聲援團體和農民所認知的公共性。此節要說明筆者在研究中所見的，農民「傳承、記憶在身體裡的農業實作知識」有哪些內涵，同時也是讓「轉化」在新圈地運動的網絡背景中成為可能的「要素」。

究竟何以農人要起而抗爭？為什麼在三十年前，當地農人就反對將自家的土地售予行政單位做為竹科三期用地呢？許博任（2011）以中科四期開發下的二林農民為例，說明工業資本和土地投機資本擴張，影響最鉅的是原本生活在土地上的農民，其中許又將農民受的影響歸納成兩種因素：一是壓縮到農村的生存空間，

專業農不但失去生產基地（包含農地、住家和存放農資材的空間），且原有的生存空間是以不等價交換被迫賣出，被徵收後難以再用補償金買回合適的生存空間，導致被徵收後農民難以維生；二是切斷農民與土地、鄰里的有機連結，農民擔心地被中部科學園區徵收後，附近的土地都會受到汙染，即使他們搬到附近的徵收區外，要以農維生也恐成為問題，且整個生活環境也都會大變，最後，農村留給老農自給自足的空間，還有鄰里親友間的相互餽贈習慣讓他們即使戶頭裡沒多少錢，卻也能過的快活，許多長輩擔心徵收後賴以維生的田產將變成戶頭裡的數字，他們就必須去依靠後輩、寄人籬下生活（許博任，2011）。以中部科學園區的土地徵收為例，農民並不被動，他們會去思考、擔憂未來恐會面臨的危機，也估算著自己的能耐和條件。

「農家子弟現在大多到城市工作，不務農了，為何不同意賣地呢？」我故意問。農人突然一手指著天空說：「天，你怎麼賣？天地相連，你要賣多少？祖先傳下來的地，我怎麼能賣？我孩子不務農，但我和老的、更小的孩要生存下去啊！」…「如果政府高額補貼或以地易地呢？」我問。「不可能啦！」農夫們搖搖手，也搖搖頭。「他們和村長的關係都很好，攏串通好了啦！給農民的條件怎麼會好？」，言語間還有更深的內幕，只是他們不便在場公開講出來。「還是擁有自己的土地好啦，從小到老的感情…」「你知道嗎？五年前工廠就開始挑人了，像我們四十幾歲的婦人，工廠已經不大想要雇用我們了，怎麼活？還是自己種田比較穩定啦！全家老小也都得靠我們種田活下去啦！」坐在旁邊的農婦們都點點頭，顯示確有這麼回事。【2010-11-15/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頭條/記者林建成 高雄縣美濃鎮報導】

也許就是農民過往在農村承襲的「要素」讓他們堅持與現代開發優勢思維對抗。

5.1.1 農民繼承的農業文化、傳統和生活記憶

回頭看二、三重埔的農民，從傳承家族記憶和祖厝開始捍衛，堅持反對土地徵收的農民 C 說道：

我們家是從新埔搬過來的，我爺爺帶著我爸爸和我姑姑涉水搬到這裡…我爸爸過來後有到東海璞玉那裏給別人當長工，（當牧童的時候）因為牛在相鬥的時候受傷跑掉了，我爸爸的屁股就被打得不能睡覺…好不容易賺到錢買了這些地，後來家裡的財產土地都是這樣努力來的，所以特別可以感同身受，不忍土地被徵收。想到他們以前是這麼辛苦才能擁有自己的田地，怎麼能賣給別人…從零到有才會珍惜…以前我們家也曾因為很不公平的原因失去六公頃的土地，我常說失去才懂得珍惜。在民國五十一年時候，我國中一年級的時候我就開始幫忙務農，到六十一年十年間，我當兵時我家裡又失去六公頃的土地，我三叔被騙、土地被騙掉了。本來是我們家的土地卻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就被拿走，不只是傷心而以而是痛心。為什麼我爸爸他們那個時候不懂的法令要被騙…（農民 C）

竹東當地居民農民 C：「新竹縣政府規劃這計畫時，將我們的客家文化完全摧毀殆盡，不留一磚一石，非常沒有文化的規劃，完全沒有考慮我們百姓的文化、我們客家人的文化，像我這裡（傳經第）也是全被規劃進去，完全不保留。…為什麼會有科學園區？因為有寶山水庫，會有寶山水庫又是因為有竹東大圳，竹東大圳是林春秀開鑿的，日據時代的政府都無法開鑿竹東大圳，但是林春秀就有辦法開鑿，有這麼大的功勞，他做了這麼大的水利工程，我們為什麼不把它（林家伙房）留下來呢。」…起造將近一甲子的劉家伙房-傳經第，是依照客家建築工法所興建的傳統三合院，依照去年新竹縣政府公佈的都市計畫，C 家伙房就被畫在徵收拆除的區段內，另外在傳經第不遠處、一座全台少見的客

家雙層三合院-范家洋樓，也面臨著同樣的命運。【2007-12-19/客家新聞雜誌
/51集-竹東二重埔的美麗與哀愁】

土地、農村環境之於農民的價值，不只是回憶和生計，而是具體生活方式的體現，若是土地被徵收，他們被迫到其他地方生活，即使吃的飽餓不死，要習慣新的生活思維恐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這也反映在土地徵收案重啟後、自救會成員向當地行政單位的怒吼中：

你看政府在農業上的補助根本不夠讓我們生活，所以農家子弟一定要學會兩、三個專長（指外出兼業），才能維持一個家庭。農地是我們家的根本，你不管失業了、或者年紀大了，退休回到家裡你都有是可以做…如果你農地沒有了，我們住到都市裡面，我們這些農家人住到都市裡你說要怎樣？很無聊耶，閒著他閒不下來，你要找人家聊天嗎？搞不好文化也不一樣、或者聊天的內容也不一樣…所以農家人應該要保持他人跟土地情感的延續…土地我們世代傳承下來，變成那麼肥沃的土地，只要種下去它就長瓜給你吃、長菜給你吃，為什麼你要把它變成鈔票？鈔票會飛走，土地不會！（農民C）

三十年前在徵收土地的時候，我還是小孩子什麼都不懂，但是那個時候我非常非常贊成徵收，因為徵收土地是為了促進國家重大建設，新竹科學園區是真的帶動地方發展…當時別人抗爭的理由我就不太清楚，我爸爸也不知道，因為農人的訊息來源很少…現在的徵收幾乎都是規劃成住宅區，我們到了這個年紀也會去想，這根本是圖利財團、圖利政府阿，那我們這些農人算什麼？所以我才會去參加自救會…接觸農業更久之後，我覺得你就是保持這些自然的模樣，對大家是最好的，像地下水的資源、碳排放量或是永續發展都可以，像我喜歡務農，我可以永續經營

我的農業…都市的小孩現在要花錢來玩泥土，以前我們是玩到怕，看到他們都覺得很可憐啊。（農民 A）

而除了土地價值外，當地特殊的自然、文化景觀資源和灌溉系統，也是當地農民十分引以為豪、與當地歷史發展密切相關的元素，這些從早期抗爭階段就開始被當作抵抗土地徵收的主要理由之一，乍聽之下會覺得農民在訴求文化景觀的保存，但事實上他們正是過往一直與這些文化景觀共存的文化主體，這些自然、文化資源正是支持農民進行生產的資源，也是構成他們農村認同的重要元素：

我們雖然是劃在特定農業區內，但是我們這邊有非常好的水源（湧泉）和水利設施（竹東大圳），種出來的東西不輸給優良農業區。（農民 C）

農民 A 的農田，就位在這處世外桃源，由將近 90 年歷史，提供大新竹地區民生、農業與工業用水的竹東大圳水脈灌溉著。在一般人的印象裡，流經都會區邊緣的水圳，經常充斥惡臭與生活污水，但農民 A 引水灌溉的竹東大圳水脈，卻是難得的清澈見底。（底線處為筆者所替換之代號）【2011-11-04/上下游新聞市集/史上最優惠的經典好米，卻是最憂愁的生產者—稻農 A】

夏日黃昏，陣陣涼風輕拂過湧泉滋養的一片綠意。跟著水道往上游走，越接近湧源源頭，就越多了一點蓬勃奔放的自然風味。先是湧泉流瀉成一條清澈的小溪澗，溪底的天然沙石是小魚、蟹、蝦和蛤最隱密的天堂。繼續沿著地塹隨清溪走，穿過茂密的草木之後，豁然開朗，一座日治時期用磚石砌成的水池就靜謐地躺在盡頭處。這裡原本是日治時期建造竹東大圳的日本技師的澡堂，後來成農民 C 童年時期最棒的戲水勝地。幾代的鄉下小孩在這裡濺起無數的歡笑水花。…湧泉、澡堂、小溪、田野、九牧第與傳經第…。（節錄至 2010 夏耘農村草根訪調文集）

從農民的角度看來，徵收一事存在著很多疑慮。一旦徵收，他們的生活、生計、和過去長期以來的情感認同都將被剝奪，而他們的犧牲是為了誰？政府每每以國家重大建設的名義進行開發，但事實上利益都進到財團口袋中，且再沒有人會「感念」農民的犧牲，意識到此的他們才必須捍衛與自己共存的農村。

5.1.2 農民的主動能量與文化抗爭元素

話說回來，農民繼承的農村相關要素，在抗爭中如何呈現呢？事實上不論是與農陣接觸以前或以後、中央層級的抗爭或地方層級的抗爭，都可以看到農民將與農村相關的文化「挪用」到抗爭上。然而這種文化意涵的「凸顯」和「挪用」並非如文化構框論中所稱—透過高度的文化符碼包裝，帶著機會主義或利用政治風向的味道，運動者的意識形態和世界觀沒有直接表現出來，而用修飾過的版本隱藏真實的意圖（何明修，2004），而是農民與外來團體各自從長久被壓抑的農村價值中，再度翻找出足以代表農村文化的元素，並透過農民討論後判斷是否合用才會採用。這些文化元素除了可以增進凝聚力、嚇阻敵人外，也可以重新宣示、定義農村的特性與價值。

在地性質的抗爭往往必須與地方派系面對面交鋒，因此農民在地抗爭的做法顯得較直接，並帶有草根文化的色彩，這些行動都是透過自救會內自行集思廣益，大家有所共識後開始分工、共同行動，有了三十年的抗爭經驗，可以感受地出當地農民的強悍和決不退讓的信念。農民 C 說，自救會的幾個發起人曾到土地公廟「歃血為盟」，發誓決不背叛自救會；曾到百姓宮詛咒與地方利益勾結的開發派民代，不久後該立委的家人出了很多意外，嚇的地方開發派人士一時間不敢動作；在縣長邱鏡淳因為二重埔交流道預定地會勘時，除了舉布條抗議、拒絕徵收外，在縣長沿途經過的路上插了一百多個稻草人，以草船借箭的方式製造現場官員的

壓力和警力的緊張；在地方說明會時也曾直接與贊成開發派發生流血事件。

紮稻草人、去百姓功詛咒官員、拜拜祭神，因為政客也是出自鄉土，他們多少也會相信神鬼的問題，就會覺得毛毛的。七一七鋪秧、曬穀，都可以呈現人與土地的情感。…文鬥武鬥加上孫子兵法的戰略，每個地方因為習俗不同會有不同的抗爭方式，所以我們會去看各地的文化來想訴求和抗爭。(農民C)

而中央層級的抗爭方式則因為需要大量動員，需要捍衛農鄉聯盟其他地方的自救會和農陣一起討論適合的行動策略，而農民在這當中扮演的角色即是提點出農村的思維與做法，確定內容後大家再分工執行，讓中央層級的抗爭行動可以引起一般群眾的關注和認同。”割稻、打穀、紮稻草，對農人來說，都是再熟悉不過的動作，但對許多年輕學子來說，農村裡藏著太多他們所不了解的新奇事物¹⁴，揉合了農村元素在內的抗爭行動，也顯得更豐富生動，比起全然口號和訴求在內的強硬作風，文化行動也讓一般民眾與媒體看到農村、反思農村的意義和價值：

從聲援大埔那次，開始有拜拜的動作，那就是一般收割時會有的動作，之後七一七或是在美濃割凱道也有。…我們群眾運動的拜拜是在七一七凱道第一次聲援大埔的時候，因為我們二重埔有五穀廟嘛，那農家人就是拜五穀爺嘛。五穀爺他是研究五穀雜糧藥草，是所有這些做自然原始的神嘛。所以我就建議把我們的五穀爺請去凱道，我提議大家可以來「上告五穀爺」，只要是農民為了爭取他的五穀雜糧喊農地，都像五穀爺或是土地公來告狀，這些都是農民最基本的神社。…五穀爺就是神農大帝。(農民C)

全台農民串連夜宿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今天上午展開第二波抗議行動，農民在凱道前用秧苗鋪成一片綠油油稻田，象徵「把田種回去」，為抗議行動畫下句點。…雲林農民從電視上看到凱道抗議活動，今早運來一甲地秧苗聲援。

¹⁴ 出自苦勞網 2010/11/14 報導「手割美濃凱稻 農民誓言奪回土地正義」

農民團體以人力接駁的方式，一個傳一個，將凱道鋪成一整片綠油油的稻田，口中喊著「農民扶稻、生生不息」口號，象徵「把稻子種回去」。現場並設香案，桌上擺滿歷年得獎農產品，農民人手一柱清香念念有詞「上告五穀大帝」表達不滿。【2010-07-18/聯合晚報/A1版/要聞】

11月14日，午後，連日陰雨的美濃，陽光總算探出頭，來自全台灣各地，面臨土地浮濫徵收所苦的農民，以及關心農村議題的學生、民眾紛紛聚集在福安里的稻田旁。在收割之前，來自美濃重要信仰中心—廣善堂，已經高齡85歲的禮生（在禮儀事務中擔任司禮、司儀者），帶領大家祭拜五穀神農大帝，除了感謝豐收，也祈求圍地毀田事件莫再發生，農民能夠在土地上安居樂業。…來自各地的農民，熟練的進行著割稻、打穀的程序，也熱心指導著前來幫忙兼體驗的學生。一旁，則有阿伯用一個禮拜前先在彰化溪州收成的另一批凱稻，加上來自芳苑的現炒花生，現做「爆米香」，吸引老老少少的目光。【2010-11-14/苦勞網/特約記者陳寧報導】

今天一早，天才剛濛濛亮，農民已早早起身，從宜蘭運來2000斤稻穀在凱稻曬穀，金黃色的稻穀鋪滿總統府前的凱稻，象徵豐收，農民並運來傳統「風鼓」現場篩穀分送。各地農民帶來自家農產品，有大埔的玉米、竹北璞玉計畫區的白米、二重埔的米板、以及灣寶的蔬果，各自教會代表共同捻香祭拜「五穀神農」，希望神農保佑，今年修正土地徵收條例能有結果，別再有農地被無理徵收。【2011-07-17/聯合晚報/A2版/話題】

除了聚集群眾、向政府表達反對土地徵收的訴求外，在各大型行動中也透過象徵農村的文化行動「召喚」離鄉離農已久的台北市民「重新」看到農村、農業與農民，”整理稻穀對農民來說，是再自然、熟練不過的日常工作，然而上了凱

道，農民曬穀卻「錯置」成了一種展演與抗爭的劇碼¹⁵。有趣的是，農民在抗爭的過程中無意或有意想要呈現出的農村文化，包含農業生產的插秧、收割、曬穀，或是代表各地的優良農產品，還有農村中將農場品互相分享、餽贈的習慣等，都在抗爭中變成代表農村的「符碼」，從農民的日常生活中被挪用至抗爭的用途。這些農村文化都算是農民的「實作知識」，透過土地徵收事件的張力，與外來學者的「論述知識」相互轉化，穩固彼此的認同，產生更多集體行動。



¹⁵ 出自 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2011/07/18 報導〈再見「凱稻」〉

5.2 以「糧食安全」的論述為例－談捲入和轉化

土地徵收對農民來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從大埔事件之後，民間有過許多的攻防辯論。由於早期台灣隨著產業轉型，由貧窮的農村記憶漸漸轉向富裕的工商業社會，各種大型的國家建設、經濟建設帶動工商發展，其中最成功的經濟建設案例又屬 1980 年啟用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被政府單位和廣大民眾視為最經典的「發展典範」；自此，區域「發展」的定義與想像似乎就脫不了工程、高科技的投入，而傳統的農業生活方式也多被視作落後、破敗的代名詞。

在整個漫長的徵收爭議期間，竹科三期預備用地的徵收及伴隨著的限制遷建，使得竹東地區的農村房屋普遍破舊失修、人口外流，許多鄰近地方的利害關係者、如投資客，也預期未來徵收後地價隨著地目變更會提高，當地也不乏期待徵收以促進地方發展、提升家族土地價值的原居民；經手相關程序的行政官員初期的態度也是依循著上述的想法：農民在農村做農也賺不到什麼錢，土地徵收後可以拿著補償金搬到生活品質較好的城鎮，又可以讓鄰近的居民享受開發帶來的經濟果實，有甚麼不好的？不願意就是嫌錢不夠多，莫非想要趁徵收的機會獅子大開口！？因此，徵收的爭議成為地方發展的兩難，也造成原居民中支持區域開發派者和保留派者的對立。對於園區開發的迷思和態度，可以從二十多年前描述反對派與贊成派意見的報導略之一二：

呂源貴說，園區徵收土地應盡量往山坡地進行，八月一日公告徵收五百多公頃，卻專門徵收一些「心臟」地帶，影響地方發展。況且，每次園區徵收土地的價錢都低得離譜，然後再高價賣給財團，豈不是魚肉鄉民，從中得利。

【1989-08-29/聯合報/04 版/焦點新聞】

前縣議員呂源貴表示，由於科學園區第三期徵收土地中，二重埔、三重埔很多都是農地，在農地農用的情形下，業主們堅決反對土地被徵收。...科學園區

管理局局長薛香川表示，科學城的發展是國家的政策，況且科學園區這幾年來的成果，也替地方帶來相當的貢獻，...地方民眾實在不應該用不理性的方式抗爭，造成廠商或地方損失。【1989-11-26/經濟日報/04 版/產業 1 資訊、電子、電機、車輛】

縣長范振宗表示，召開座談會主要是聽取雙方意見，希望業主能仔細思考，為下一代著想，不要成為歷史罪人，至於徵收不徵收縣府已有腹案，關西、峨眉也都有地，新竹縣府一定會設法留住科學園區的擴建。...贊成徵收業主指出，大家不能老是抱著「貢丸米粉」，應該迎接新的建設引進高科技廠商，才能繁榮地方。...反對業主則表示，竹東地區腹地不大，發展空間有限，如果精華區被徵收，農民轉業困難，如何過生活，而且土地徵收補償價格扣掉土地增值稅，所得並不多，對下一代無法交代。【1991-03-29/經濟日報/18 版/地方綜合經濟 工商服務】

先不論徵收價錢、程序是否合理，反對徵收者的堅持常會被外界窄化為「錢的問題」，而缺乏關於土地價值、人地連結、農業價值的討論，在此主張，如何使徵收討論之於反徵收農民，從「捍衛自我財產」轉變成「捍衛公共資源」；讓一般民眾，從原本「無關已事」的「地方開發議題」，轉變為眾人共同視「土地徵收」為是「對糧食安全的威脅」，便是本段落的重點；而在此變遷的過程當中，也牽涉、反映了竹東二、三重埔地區反徵收農民本身對於其土地價值認同的轉化。

「轉化」在楊弘任（2007）的解釋下就是不同群體彼此要「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因為不同群體具有不同的生活慣習和理解知識的方式，因此如何讓彼此發現之間具有的共同利益¹⁶，進而捲入到同一個網絡中，則是行動者網絡

¹⁶ 轉化的重點並非去探究不同的行動者間是否「真實」存在著共同利益。而是不管是否為真，大家都共同認可某件事是他們的共同利益。

理論的重點。如同《社區如何動起來？》一書中，林邊鄉原有深層的派系困境，土地徵收也涉及了各方複雜的利益差異：光是徵收區內就有尚在務農／已不務農、贊成徵收／反對徵收的差別，另外還可粗略劃分出徵收區外期待地方發展的鄰近居民、推動徵收程序的縣政府、站在保護農業農地立場的外來非政府組織和聲援學者／知識分子，以及透過大眾媒體接收到竹東二、三重埔地區土地徵收訊息的一般民眾。然而在這樣複雜的認同關係之下，如何打出一波關注竹東土地徵收案的高潮，則是看不同行動者如何在過程中牽連出這一波行動。

蔡培慧¹⁷(2010)在〈真實是一場社會行動－反思台灣農村陣線的行動與組織〉一文中提到：『**論述爭奪的壕溝戰發生於行動之中，「真象」是不斷透過行動定義、建構、修正、消解、再重新定義的迂迴過程，社會的改變來來回回地折衝，就發生在壕溝的近距拉扯間。然而論述也不是憑空發生，它鑲嵌在組織者的行動網絡中…（粗體為筆者自行標示）**』，並在文中以「圈地」一詞舉例，認為「圈地」作為政商合謀驅趕農民的具體象徵之所以成為主流媒體的語言並非偶然，而是在將近兩年的反抗行動中所觸發的社會認識反映於主流媒體語彙中。”這個過程或许有方向性，但並非全然有架構的組織推展，它或許很大程度的仰賴某種偶然事件，然而偶然事件能擴展或觸發深層結構的討論，則必須建基於日常組織工作的必然（蔡培慧，2010）。”筆者如何看反徵收農民「理解」土地徵收並有所行動的角度，與蔡看媒體認知何為「真實」並傳播的角度相近，且蔡在文中認為真實的實踐必須要依靠（一）公共傳播，並有界定內容的必要；（二）組織串連，以擴大行動的聯結，其中「草根串連」是理解勞動內涵、草根語言，以駁斥政府部門宣傳的假象之要件；（三）立法遊說，嘗試與當政者對話，介入實質政策，進行階段性的改變，這三個面向也可以在本研究中補充說明，台灣農村陣線做為一個外來知識份子網絡，如何在機緣進入竹東當地後，積極與當地反徵收農民互動，並在各種機緣之下以不同方式推動議題的討論。由這樣的角起頭，再開始討論「糧食安全」

¹⁷ 同時為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

的論述是如何在不同行動者間來回型塑，最後成為農民與眾人共同認知「土地徵收危機」的重要「真實」。

大埔事件發生後，苗栗縣政府暴力粗魯的行動引起社會大眾的反彈，因此在當下「捍衛家園」和「農民與土地的情感」開始形成各地自救會主要的抗爭論述，直接反應土地徵收條例的不合理，侵害農民的居住權與生存權。各地自救會和非政府組織台灣農村陣線在 2010 年 6 月 19 號發表的農民反粗殘徵收聯合宣言，和隨之緊急發起的 717 凱道守夜行動，在宣傳文案中尚未出現類似「糧食安全」的論述，而是簡單地強調農業生產的必要和農民的生存權，並訴求政府單位的無理，希望可以喚起大眾和政府對於農村的同等尊重：

沒有米，怎麼果腹？沒有鄉村，怎麼有都市？台灣社會的根基在於農村；農村是我們的來處，也是我們的去處。…事實上，我們農民已經替台灣社會犧牲太多太多，只為換取進步或現代之名。日本政府強逼我們把甘蔗繳會社，國民政府強逼我們拿稻穀換肥料。政府說要「農業扶植工業，工業回饋農業」，卻從來只有落實一半。台灣的經濟發達了，物價全面上漲，唯獨米價不漲！台灣社會前進了，卻遺忘了它的來處！… 1990 年代台灣為求加入 WTO，不斷壓抑農業，農地被迫休耕；2000 年農發條例修正通過以後，農地種起別墅；2010 年產創條例通過以後，農地餵飽財團。過去，政府剝削我們的勞動和作物；現在，政府和財團聯手奪去我們的農地和身家。在不公平的遊戲裡，農民甚至失去最基本的生存權。發展的大旗閃閃發亮，明明灼灼，都是由農民的苦難所點綴。我們在此沈痛地呼籲政府，終止浮濫的土地徵收。土地作為最珍貴的資源，必須公平管制、合理使用，不可獨厚財團。（2010/6/19 農民反粗殘徵收聯合宣言：一方有難，八方來援！）

政府與財團合謀，濫用行政權力強制圈收農地，多處優質農地正大規模地淪陷為工業用地，成為政商炒地皮或累積資本的禁嚮，徵收暴行不但侵害農民

的居住權與生存權，也是台灣農業發展的空前危機。…7月17日晚上請大家一起站出來，夜宿凱達格蘭大道，力挺台灣農民，爭取永續農業的生存權，抵抗惡質政商結構，唯有人民將憤怒的情緒，化為團結與行動的力量，政府財團化的傾向才有改變的可能。(2010/7/17 台灣人民挺農村 717 凱道守夜行動)

雖說台灣農村陣線的自我定位是關心台灣農業、農村發展的非營利組織，然「土地徵收」政策本身並非農陣的主要焦點，而是希望透過此公共議題進一步帶出台灣農村發展背後現存的諸多問題。除了台灣農村陣線之外，也有許多民眾從大埔事件後開始關注到土地徵收議題，怪手鏟田事件某種程度上喚醒了大家對於農村問題的好奇與探究：

農民之後，有更多青年學生、社會人士，沒有人知道他們真實身分，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否舟車勞頓，就為著一股相助義氣，再遠、再累，也要陪著農村一晚，他們總是官方口中的「不純農民¹⁸」，意味著他們不懂耕田、不務農，也要跑來插花抗議，暗喻活動的不正當性。但是愚昧的政府永遠不懂，一些人神共憤之事，不只農民，不只學生，就連一般路人，也是憤慨不平，出面相挺。【2010-07-26/漂浪。島嶼—munch/717 農村正義守夜行動一天明之後，美夢成真？】

平時以農業作為主要生活方式¹⁹、在鄉間生活的農民，與缺乏實際務農經驗、因為理念而主動投入關心的「公共知識分子」之間之所以產生共識，進而一起行

¹⁸ 2010/7/17 當天記者詢問農委會主委對農民夜宿凱道的想法，時任農委會主委陳武雄表示「來抗議的很多不是農民」，暗指群眾可能是有心人士動員而來，這樣的言論除了分化群眾外，推托之間不願直接回應土地徵收對農業造成的危害。

¹⁹ 會強調「生活方式」而非「經濟來源」，乃是因為台灣農業所得偏低，農民兼業情形普遍。但農民家中若有維持農業生產，還是到處可見由農業生產延伸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學。

動，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觀察和磨合的²⁰。台灣農村陣線和以農民 C 為首的二、三重埔反徵收自救會結識之後，農陣成員積極地支援與徵收有關的所有會議，而與農陣合作的學生社團也組成訪調隊，將更多人帶入二、三重埔拜訪反徵收的農友，關注、瞭解土地徵收的前因後果，以回到校園中將所得之觀察感想向外傳播。在密集地與外來行動者接觸與溝通下，當地農民決定要主動出擊，串連全國各地的反徵收自救會，組成「捍衛農鄉聯盟」，並進行組織培訓、分享彼此抗爭的組織技術。2010 年 11 月 12 日，呼籲政府修改土地徵收條例的農陣和農盟再度召開記者會，公布擬定完成的民間版「土地徵收條例」，該次記者會新聞稿²¹中開始提到「糧食安全」的概念，但是描述的內容尚存在表面字義，而未深入論述：

捍衛農鄉聯盟會長農民 C 來自新竹二重埔，就住工研院附近，他表示他們 30 年來力阻政府各種不公義的開發案，就是為了爭取永續務農的權利，**新竹去年與今年冠軍米都從當地出產，這麼良好的務農環境是子孫居住與全民糧食安全的最終依靠**。而捍衛農鄉聯盟來自全台 10 個自救會代表聯合表示，政府不要輕忽農民堅定但溫柔的務農意志，請立即停止圈地，並儘速通過民間版本土地徵收條例，還給農民永續的務農環境，**確保台灣在未來石油危機與全球極端氣候的威脅下，仍能有安全無虞的糧食供應基地**。(2010/11/12 公布民間版「土地徵收條例」記者會)(粗體為筆者加註)

2011 年 2 月底，學者彭明輝在「捍衛農鄉聯盟共識營」活動的邀請下，以「糧食安全」作為演講主題，和農民說明台灣農業大環境面臨到的危機，引起很大的迴響；講座結束後，在場農民一致認為跟糧食安全相關的論述非常有力，替大家釐清、連結了許多分散的想法，並提議會後各個自救會分別邀請彭去演講、分享，

²⁰ 許多徵收區農民在行政過程中因為不了解徵收程序，被仲介業者和政府行政人員威逼利誘而蓋章或交出權狀，因此對於外來的陌生人有戒心在所難免。而農陣也並非跟任何反徵收的自救會都可以合作，譬如面對以提高徵收價錢作為主要訴求的自救會，農陣的立場是無法進一步合作的。

²¹ 本論文中所引用的新聞稿皆節錄於台灣農村陣線在 2012 年底出版的《土地正義的覺醒與實踐：抵抗圈地文集》一書中。

讓各地的反徵收農民往後在應對徵收問題時，可以建構出更完整、清楚的論述。農民 C 即在兩個多月後邀請彭到二、三重埔自救會再度開講，將「糧食安全」的概念分享給當地自救會的成員。

主要一般人土地被徵收的時候他會說他不要被徵收，但是他講不出法源依據，講不出道理和法源引用，反對徵收有文鬥和武鬥，因為看不懂公文和法律所以一般的農民一看到公文就投降了。但是我們現在抗爭比較有經驗就會比較知道要搞清楚為什麼要徵收，公益性必要性在哪裡，要讓我們心服口服，如果說實在沒辦法反對那要怎麼要求未來配地的問題，怎麼跟政府談我們的保障在哪裡。... 因為農陣有學者學生律師可以協助全台灣被徵收的自救會和土地，文鬥也要有武鬥也要有，有農陣和學生來加入之後，各自救會就會更有力道，大型的活動就會讓政府有壓力...更有信心覺得我要保護糧食，加上這些教授講糧食的安全以後，大家才發現到，因為訊息是農民最弱勢的阿，國際上的訊息農民不知道，所以彭明輝等老師和律師來講過之後，各自救會才知道，原來我們的農地是這麼重要，不只是要保護自己的土地而已，而是更要保護台灣的糧食，保護台灣的弱勢，所以訴求就更強而有力，更公共化。...所以這個議題變得非常的重要，這些連結更重要，所做的不是為了誰的土地，而是為了台灣整體的土地，為了台灣整體的國土規劃，為了台灣後代子孫的糧食再規劃，所以意義就更大了。(農民 C)

一年間的時間，政府持續冷回應，沒有正面應答農運團體修法的訴求，而台灣討論糧食安全的聲音漸漸多了以後，農盟和農陣也在醞釀再度聚集凱道的力量。大家開始計劃在 2011 年象徵性的在去年同一時間，7 月 17 再度回到凱道上，而為了讓 717 的行動可以號召更多群眾來支持，在 7 月 17 日之前農陣和農盟也安排了幾個熱身的活動，其中一個便是與國外農業相關團體連線，聲援台灣農民的國際記者會。

台灣要積極參與國際社會，不能只偏重經濟導向發展，與全球永續價值串連，才能真正彰顯台灣社會的進步價值。記者會現場台灣的農民團體「捍衛農鄉聯盟」也會直接與巴西無地農民運動組織者交流對談，雙方認為在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下，唯有加強保護農地與永續水資源，才能使環境免於惡化並維繫糧食安全。(2011/7/6 停止圈地掠奪，信守承諾立即修法 國際記者會)

土地徵收危及糧食安全和農民生計。台灣農村陣線成員、關注全球南方(Focus on Global South) 實習生陳思穎表示，許多國際組織包括關注全球南方、穀物組織(GRAIN)等，都注意到台灣近年來頻繁的土地徵收問題，但台灣政府卻還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2011-07-06/過於孤獨的喧囂/國際組織關注土地徵收 聲援台灣農民/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

聯合國地球日暨另類諾貝爾獎得主 Vandana Shiva (席娃博士)，對台灣農民重返凱道，以連線方式表示聲援，她表示土地被大量剝削，已違反人民居住權利，土地使用必須符合公共利益，也必須公民參與，做最完整考量。…巴西無地農民組織(MST)發言人艾力克斯上午也表示，巴西為推展生質燃料，大量砍掉熱帶雨林，栽種單一物種的大豆與甘蔗，不但排擠其他農作生產，也破壞生物多樣性，也使當地農民工資大減、失業率提高、生活受影響，值得台灣參考。【2011-07-06/聯合晚報/A7版/焦點】

十天之後，7月16日捍衛農鄉聯盟及台灣農村陣線發起的「716 全台農民重返凱道－捍衛土地正義、守護糧食安全、永續水資源」行動，其標題即很明確的出現「糧食安全」一詞－代表「糧食安全」已成為農民和外來團體間共同認可、可闡述當前台灣農業問題的重要詞彙，且從大家開始使用這個詞彙之後，對其認知的內容也逐漸深化。

晚會過後，晚上 10 點至 12 點是大樹腳論壇時間，農民與市民們分別選擇「土地徵收」、「糧食安全」、「永續水資源」等三子議題，在三頂茅草屋下交流討論，將整理出台灣永續未來的關鍵十問於第二天晨間記者會發表。…面對政商壟斷勾結，搶奪水土資源，農民們與社會大眾已覺醒，藉由重返凱道的行動，呼籲政府不可再漠視農業議題，同時要求政府必需儘快修訂圈地惡法，堅持土地正義與永續水資源的制度改革。重返凱道行動訴求：一、立即修正土徵條例，反對政商與農搶地；二、要水資源分配正義，反對政商與農搶水；三、**還我糧食自主安全，反對忽視台灣農業。**(2011/7/16 716 農民重返凱道 堅持土地正義，力抗搶水圈地)

夜宿後的隔天早晨，農陣與農盟也提出「台灣永續未來關鍵十問」，當中許多問題已包含糧食安全的概念在內：

2. 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 2009 年之統計，從 1999 年（糧食自給率從）40%提升到 41%，光 1 個百分點日本就努力了 10 年，試問台灣如何在 9 年間達成提升 8 個百分點，政府的具體措施為何？
3. 世界各國早已把可耕農地視為戰略資源，台灣也已體認到農地的國安意義，為何還要不斷徵收優良農地？
4. 請政府回答，在石油價格與進口糧價持續上漲的現在，未來台灣要能持續養活全國人口，需要多少農地？
5. 若政府要推動農地復耕，提高糧食自給率，該如何調整現行浮濫調度農業用水的水資源利用方式？
9. 現代飲食過度加工，導致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引起社會恐慌，政府對於如何維護優質農業生產環境、推動在地新鮮食材、確保國民飲食健康，有何對策？

(節錄至 2011/7/17 台灣永續未來關鍵十問)

而在第二年的凱道夜宿結束過後，農政主管機關農委會才在報導中提到相關概念，雖然後知後覺的應對，也沒有任何承諾，但是終究是被輿論逼著面對糧食安全的議題：

農委會主委陳武雄指出，政府非常重視農業，為糧食安全已展開農地總盤查，年底將完成。目前資料上我國優良農地有 30 萬公頃，加上各類一般農地，共有 81 萬公頃土地。農委會算出，在極端情況下國人每天要攝取二千大卡熱量，則需要 71 萬公頃農地。但現有 81 萬公頃土地的量是否確實，質量究竟如何，就必須完成總盤查後，取得正確資料。【2011-07-17/聯合晚報/A2 版/話題】

然在此並非直指二重埔與三重埔的自救會農民，現階段僅在複誦一個被指導的反徵收論述架構、單向地取用學術的字彙來說明自身的故事脈絡，相反地，本文主張當前以糧食安全為號召的抗爭策略，是在捲入了更多田野內、外行動者的過程中，由當地農民作為稻米生產者的既有生產觀、土地觀基礎，轉變(transform)、轉化(translate)為不同形式的認同。

在「糧食安全」的論述出現之前，當地農民的既有知識雖並未直接以精確的詞彙指向糧食相關的議題，甚至有自救會的成員也表示，會以「糧食安全」作為抗爭策略的考量，「實在說，是大格局大方向啦，是為了全台灣人，但是真正種田的人他比較不會用這種方式(說明)啦，我種田人我怎麼沒有糧食啊?(農民C)」，言下之意即顯示，糧食安全或永續發展概念的思維對他們來說並非全然是新概念，而是與當台灣農民既有的歷史經驗、生活習性相通，唯相關的意識形態與概念係以較為通俗的語言呈現：

你被徵收以後、你只有鈔票的時候你就會開始擔心了。以前日本人跟國民政府那時候在作戰的時候，是一兩黃金換一斤菜舖，「兩隻雞換兩間樓房(閩南語)」，那時候四萬塊的日幣到國民政府來的時候只換一塊錢

的台幣…還有一段時間，規定稻穀必須要交出給政府不能自己留，就會偷偷把稻穀和泥土混合，抹在牆上，要吃的時候再摳下來洗一洗…所以災難來的時候，糧食是最重要的（農民C）

此外，若只將糧食安全議題作為抗爭組織技術的認同、視為二重埔與三重埔自救會單向地接收外來專業運動團體或學者的主張，便是對在地的主體性、以及新圈地運動後的反徵收網絡之內部動態有所誤解了：

請人來演講、開記者會等等會影響，但當地有三十年抗爭歷史，至今仍然維持農業除了客家文化的傳統外，他們不是沒有在思考農業是怎麼一回事，雖然說他們可能也會服膺社會的主流價值，會覺得「作農就是比較沒有前景」，但是這些思考也都在他們的腦海裏頭，只不過在語言也會轉借，在過程中我們也會引用農民的語言，比如說這個什麼「土匪至少還會留一個碗，結果政府卻整碗弄破（閩南語）」，就是說我們也會去把這些精確的語言、包含說農民對水圳（環繞二重里地區、自日據時期開發的竹東大圳）很重視，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去學習、發掘到的，所以我覺得這個部份是雙向的。所以像農民C會開始去講「糧食安全」、「永續務農」的概念，那個是他們本來就在思考的東西，只是他用一種比較”恰當”的方式講出來。…我們內部一定有一些思考，當有一些觸媒出現的時候，轉化就會發生，那個轉化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那個人本來的「質地」，我所謂的「質地」包含那個人內在在思考的東西和他的經驗，一定也是有那個基礎嘛，不然轉化是不可能發生的。（台灣農村陣線成員E）

農陣在從事農民的組織工作本來就是必須要彼此看見，比如說一開始農盟的會議是在同樣的地方開（二重埔），但是後來我們覺得這樣不太好，就輪流到不同的徵收點開會，這樣才可以讓農民彼此看見。還有一些是超越共同經驗

的議題，例如說二重埔有在抗爭、灣寶也有在抗爭，他們有些共通性，可能是政策或是發展獨尊工商，所以我們再做這些工作本來就會把這些超越個別經驗的東西帶進來，這本來就是我們對農民會做的事，所以我覺得在這當中就會彼此撞擊出一些語言。可是你仔細看這些語言也是農民的選擇性的應用，農民要選擇語言來說服人，不管是地方政府還是來訪問的記者或是外來訪客之下做的選擇，像是他們武器。如果本來只有講地方性的經驗，他可以講的可能只有 ABC，可是他現在了解了國際狀況或是其他地方抗爭的經驗，可能就會多了 DE 和 FG，就可以增加他論述上的內容和不同的層次，所以這不能說是什麼人講了甚麼話影響了他們。我們影響了農民、他們也影響了我們…我覺得這些語言是農民的選擇，和轉化，他們內在也一定也有這些思索這些焦慮，所以他們才會意識到、“catch”到這些語言，或是他們以前不知道有人是用「糧食主權」、「糧食安全」這種語言和概念在講這個，就像我們學術會不斷的精煉我們的語言嘛，我們有比較規制化的學習過程，可是我覺得農民的經驗已經有很多累積了，只是這些經驗和比較概念性的語言要怎麼“catch”怎麼碰撞，可是你不能說農民沒有這種思考。(台灣農村陣線成員 E)

然而「糧食安全」是一個大的概念，並沒有區域的限定，那台灣那麼多的農村、那麼多的徵收案，何以竹東地區的抗爭行動會在新聞版面上成為話題呢？這就涉及新圈地運動後當地傳統反土地徵收網絡與稻米品質提升網絡的相互捲入。自 2004 年以降，無論是以「經典好米」、還是「冠軍米」等頭銜為號召的鄉鎮級或全國稻米品質競賽的設立，順應了所謂農產品的「品質轉向(quality turn)」(Ilbery & Kneafsey, 1998: 331; Goodman, 2003: 2:)，由產出數量掛帥轉而注重精緻與品質控制—如此的策略也反映在地方農會站在第一線與農民直接的輔導、推廣上，在本文所關注的竹東案例中，更進而透過農會與農民建立起的社會網絡與人情基礎、鼓勵農友參與地方性的稻米品質競賽。

既然抗爭的主體是農民，當然不能忽略他們在耕作上的堅持和農業經營上的企圖。「糧食安全」的理念之所以可以在竹東在地實踐，讓外界看到這並非只是抗爭的口號，靠的就是幾位帶頭農民繼承了過往的農耕經驗，並與外界（如地方農會、地區農業改良場等）資訊接軌而從中悟出的務農哲學，不只要糧食的「量」是安全的，「質」也是要安全的。有別於傳統慣行農業的生產模式藉由農會指導員在當地進行第一線的推廣以來，土壤品質的管理、生產力的維持即滲入二重埔與三重埔幾位農民的農作生活當中：

我跟很多人不一樣啊，我種米是要自己吃的，自己吃就要呷健康啊，農藥本來就不好…以前種稻是求量，現在原則是種好吃啦（農民B）

所有植物都需要很好的土地，需要土壤品質的管理和用藥的控制...這是我個人有去改良場上課、跟外界接觸之後累積的觀念啦，但是有些老農還是一輩子都不改變啊，他們會說「只要長出來、長得好就好，我都這樣吃長大的啊」，他們不知道怎麼保護土地（農民A）

農民A獲選十大經典好米冠軍得主後，在相關的報載中也記述了他是如何將無毒耕種與保護土地、環境的理念連結：

尤其看到竹東附近許許多多農地被建商切割，蓋成一幢又一幢的鄉村型別墅，以青山、綠水、好空氣為號召，吸引來自都市的中產階級或投資客購買，體驗農村生活，A不禁反問：「同樣都追求好山好水，這些住戶是否也應當跳出來反對竹科三期的徵收案，因為農地消失，不只破壞好山好水，更加深糧食危機，豈能事不關己？」（出自上下游News&Market新聞網）

經歷語言雙向的撞擊，在當地與時俱進的生產經驗與生產模式基礎上，通過

經典好米殊榮的獲得、以及農民和外來知識份子的語言互相轉用，反而整合、豐富了相關的資源，拉高了土地徵收議題的高度—除了原本訴求的農村價值、居住權、耕作權外，當地農民更有本錢要求良質土地的保留、而得以被重視。

二重埔不算是地方議題，從大埔事件之後，二重埔變成像是一個象徵性，從竹科時代就開始抗爭的土地徵收點，雖然他本身的急迫性沒有那麼強，沒有像灣寶、相思寮那樣被大篇幅報導，但是在抗爭的過程中這個地方也有被認識到。我覺得農民A得獎（十大經典好米）的這件事只是更落實了農民本來的主張，農民覺得我這邊有湧泉、大圳、是水的源頭，可以種出品質很好的米，但是原本只是主張和宣稱，農民A得獎就是證實了這件事情，因為其他地方農民可能也會說他們當地好山好水，但是就沒有機制可以證實，所以農民A得獎讓當地抗爭的論述變得非常有正當性。再來，大家可能覺得這之後報導比較多，但是十大經典好米本來就會獲得報導，只是過去的報導都著重在產地特色上，但是農民A因為同時具有兩個角色，農業生產和土地抗爭區農民，他就讓"台灣農業的困境"在他得到十大經典好米之後被爆出來，被突顯出來。這兩件事情本來就都有衝突性和被一定的高度的，只是這兩件事撞在一起又墊高了被報導的高度。…任何的得獎都有機率的問題，也許農民A得獎也是運氣，但是不是偶然並不重要。只要在徵收區得獎了，就會凸顯徵收的不正當，農民的困境被凸顯了。(台灣農村陣線成員E)

優質產品（quality products）作為一種策略與訴求，在國內外也被應用於鄉村發展相關的範疇—唯多是與社會變遷或特定的產業困境緊密相連：如因應農業產值與產業地位的變化、一國之國際貿易政策的調整、躋身特定的國際組織（Ilbery & Kneafsey, 1998: 329; Evans et al., 2002: 317; Goodman, 2003: 1; Baukó & Gurzó, 2001: 361）等。隨著優質產品的行銷，產地（place）多得以與產品聲譽交織在一起（Ilbery & Kneafsey, 1998: 330; ; Feagan, 2007: 24），由台灣全國性稻米品質競賽

成果所顯現出的意義，不只強調了透過競爭所促成的品質管控，更同時使各媒體平台的鎂光燈聚焦於脫穎而出的獲獎者及其背景—包括生產地域、農作經歷等—在此更彰顯了獲獎者所身處鄉鎮之區域發展爭議，即孕育優良稻產的優良農地面臨被徵收的危機。透過「糧食安全屬於國家安全、農地保護／留與永續發展」相關主張作為當時階段性的抗爭組織技術，竹東二重埔與三重埔的土地徵收爭議突破了傳統地區性尺度的發展議題，一躍成為全國性的糧食保護問題而獲得來自多方的關注。

從糧食安全論述的形塑過程，我們可以看到不同行動者間的「轉化」經過了四個階段構成共同行動的力量：(1) 問題化—定義糧食安全，並引用過內外的例子來舉證土地徵收對糧食安全的危害，透過不斷的論述讓農民、外來知識團體和一般大眾都對此有的了解；(2) 利害關係化 (**Interessement**)—農民、外來知識團體和一般大眾都認知到，如果不想讓整個國家面臨糧食危機，保護農地、反對徵收與支持農民和優質農產品是大家共同的責任；(3) 捲入 (**enrollment**)—有上述認知後，一般大眾反對土地徵收等農業議題有更多了關注，漸漸被捲入反土地徵收的網絡中，農民和外來知識團體則是彼此間有所共識，持續合作、擴大行動，逼相關政府部門表態、回應糧食安全的問題；(4) 動員 (**mobilization**)—反土地徵收的網絡進而成為當下可廣納所有農業議題的重點，「反對土地徵收就是支持農民、重視農村價值」的形象讓非土地徵收區內的農民、渴望優質農產品地一般大眾和對現代發展有所反省的群眾都一起站出來支持。

5.3 從抗爭中新生轉化的農業價值與實踐

前面章節描繪網絡互動過程和轉化的內容，至此，隨著抗爭行動的進程，竹東當地反徵收農民的農業價值有了「再定義」與「實踐」的轉變。換句話說，當地農民對於「農業」的認知透過抗爭重新型塑、建立。會這樣判斷的原因很簡單，只要了解：農業具有勞動的本質，如同過去人家說的「作農」、「作農」，正代表「農」是被「作」出來的。若是一個農業運動只有學者光用腦袋中的知識想像、用嘴說出的論述，相信完全無法代表農業，也沒辦法向今天獲得那麼多人的關注和支持。有農民在運動中實際「作農」，體現論述中所說的那些農業的貢獻和意義，才是一個運動真正會被群眾認同的重點。一體兩面地，對農民和外來知識團體來說，在抗爭的過程中必須不斷要與縣政府和中央政府對招，也必須持續深化農業論述的內容才能獲得更多群眾的認同。於是，農民也在網絡互動和與外來知識團體相互轉化過後，對農業有新的認知和經營上地實踐改變。

以農民 A 為例，因為農陣關係土地徵收議題，所以開始有學生進入二、三重埔進行訪調，與學生互動的經驗造成農民 A 在經營農業上很大的轉變。中年回農的 A 原本是將農業當成營生的工作在經營運作，即使對農業有些感情或獨到的理念（無毒農業），但是過去農業對他仍是工具性的，對他來說農業的價值不出於賺錢、個人情感和工作上的成就感，多侷限在個人現實的了解上。接觸到學生社群和反徵收自救會後，他開始了解農業不只屬於農民，而是與其他不同群體的人都有連帶關係，他所種的農作物也會變成消費者桌上的食物，彼此間的連結比想像中緊密，因此大家都可以來關心、了解農業，且他們平時覺得理所當然的資源、行為，其實在外來人群眼中都是特殊且具有重要意義的，這便是農民逐漸「再定義」農業價值的過程：

一開始是農陣的草根調查，2010 年的草根調查開始跟學生大量接觸，覺得跟學生在一起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好奇為什麼他們會對農業有興趣，而且還很

多是台大、清交的學生，他們以草根調查的名義來協助這些農人…如果是老農的話應該比較無法接受（讓學生幫農），因為實際上完全幫不上忙，但是我也想看看現在的學生都在幹嘛，所以我就毅然決然的接受。從這裡開始，我找到一些方向，因為這些年輕人要的東西並不是像功利社會這麼現實，他們還在找一些定位和方向，也會（探討）說以前農業是甚麼方向，現在的農業是甚麼樣，所以從那一次開始我就覺得學生這一塊真的要辛勤耕耘，耕耘的意思是指教他們怎麼愛護土地。…那時候我就想說，哇，這些學生這麼有理想，說實在我也是被感染到，第一次他們五天四夜，就睡在倉庫的大冰庫裡，每天晚上就在聊天，我就覺得台灣農業是慢慢有希望的。在後來因為又爆出一一些糧食危機、氣候危機等等，我覺得這些學生懂得比我們的農人還多，竟然沒有做農還可以關心到這些問題，所以我就決定學生這一塊我一定不能放棄。學生懂理論但是不懂實際的操作方法，所以他們來這邊就可以看到一些實際的工作，所以我不喜歡他們來一次就走掉，這樣他們沒有看到任何東西，所以我覺得從種植稻收成都要看到。泥土、空氣、水都是很重要的問題，氣候如果變了，那我們的植物怎麼辦？這些就是我跟你們學生學的，我覺得對我來說幫助很大，我跟他們就跟互惠一樣，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也讓我覺得變得很年輕，衝勁都起來了，這樣就差別很大…。(農民 A)

2010 年下半年，農陣另一個民間組織 Y 計畫合作一系列讓年輕人到農村探訪的活動，在清、交大的學生社團因為在夏耘訪調期間曾在農民 A 的農田活動的經驗，便替組織 Y 和農民 A 牽線，自此之後組織 Y 多次與農民 A 合作，舉辦以學生和年輕人為主要對象的農事體驗活動。雖然這聽起來沒甚麼大不了，但是對於長期流失年輕勞動力、罕見陌生人的農村來說，光是一群學生走在田間小路，或是一群年輕人在水田裡笨手笨腳的活動著，都足以吸引鄰近的農村居民佇足多看個幾眼，因為如此熱鬧、生機勃勃的場面在他們原本的經驗中是從來沒見過的。農

民 A 的鄰人們也許不是這場反徵收運動的主力，但是當地的農村因為這場運動而受到微妙的影響，當地開始有年青人出入、經常舉辦大型活動、常有媒體進入採訪等等。而農民 A 當然是處在變動的最前端，接觸到新的社群和新的經驗都不斷推著他思考和行動，如何讓農民擺脫過去的頹勢、如何讓更多人願意投入農村、參與農村？就農民 A 過去的經驗，他知道只要有新的嘗試就會碰出新的火花，這也促使他順著他的想法作出新的實踐：

為什麼會想辦農務體驗呢？說實在我根本沒有甚麼好處。現在農村年輕人在務農基本上都沒有，年輕人沒有積蓄回到農村要玩農村真的很難很難，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在我這邊玩農業，大家要知道要務農永續，也不能少了錢耶，所以讓學生在務農這方面有機會學趕快來學，以後要不要務農再說(判斷)。…以前農人也都不學電腦，覺得跟電腦根本沒有甚麼關係，要不是台灣農村陣線成員 D把他的舊電腦搬過來逼我學我也不會學，但是學了以後覺得很有用。所以學生也是，現在學農可能不會用到，但是以後會不會用到就不知道了。(農民 A)

農民 A 的思考開闢了青年人可以實際有機會感受農務的空間，這又是當地持續捲入群眾支持者的另一大因素，這些實際的勞動和身體感受讓年輕學生可以體會到農民曾經有的那些體會，也讓農民可以了解年輕人所關心的議題為何、要如何找出彼此都在乎的共同要素。農村中其他人其實也都在注意著農民 A 的一舉一動，農會看見了體驗農務活動背後的休閒需求和農業推廣效益，農民 C 藉著農民 A 的經驗發覺這有助於推廣反徵收理念、號召支持群眾，因此也都在後來逐漸跟進，參與群眾也從學生族群擴展到一般親子家庭。農民漸漸意識到與外界互動的重要，他們不再只是待在農村內默默地生活、生產，主動邀請不熟悉農村的群眾走進農村，參與、體驗農民文化和農民生活。這跟過去農村被動成為被都市居民休閒、觀看和消費的場域不同 (Urry, 2007)，農村與都市間的界線也變得更加模糊：

為推廣竹東優質地瓜，竹東地區農會舉辦「2011竹東樂活田園之旅系列活動」，明天上午在二重里五穀宮，明天上午在二重里五穀宮旁稻田舉辦田園控窯活動，每10人一組收費1200元，當天有創意米食DIY、農民市集，還能免費品嚐冠軍米做成的米冰淇淋。【2011-12-09/聯合報/B2版/新竹生活】

農民A17日將在新竹自家田間舉辦「地瓜農學課」，招募有興趣了解農事的大小朋友一起來，一方面來看看這片面臨徵收的土地是多麼好的一等良田，另外，實際參與地瓜的收、撿、選、包，透過控窯體驗與田間的勞動學習，享受工作後流汗吹風的無比暢快。歡迎有興趣體驗農事的朋友一起到他的田中「半農半玩」。【2011-12-09/聯合晚報/A10版/私房秘笈】



陳同學就讀大學時，曾經採訪過小農，對土地有濃厚興趣，去年3月到竹東親自下田、插秧，「腳踩在泥土的感覺就是不一樣！」她也持續關注相關議題，甚至主辦插秧活動，透過社群網站號召，吸引近60人共襄盛舉。…「不要讓農業出現斷層！」農民A是去年全國十大經典好米的得主，連續3年都提供土地讓來自各地的學生體驗下田，插秧期約在每年3月或7月，而7月還供地讓學生種地瓜，昨天也端出自種的地瓜犒賞學生。陳同學此次透過臉書、上下游新聞市集等網站，吸引到近60名「舊雨新知」，農民A表示，希望下田實習活動能延續下去。【2012-03-05/聯合報/B1版/新竹、運動】

雖然這些體驗活動對當地整體農業生產和產銷方式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為對老農來說嘗試並非可以輕易邁出的一步，但至少稍稍動搖了他們過去守舊的、覺得農業就是該如何、不可能改變卻也看不到未來的那種想法。同時，對農民A來說，脫離「慣行農法」也是一個正在發生的進程，雖然他本來自身就決定改以不施農藥、少施化肥的方式耕種，但是在反徵收與稻米品質網絡交揉在一起之後，

他才更強烈的體會到社會上的需求和聲音，更篤定地往這條路前進，更能認知道整個農業政策與農民間的連結並適時做出選擇與回饋：

我以前做生意的時候，生意人對土地是很沒概念的，都只是想著要賺錢，回來務農之後才漸漸知道土地的重要性，還有「糧食安全」、「有機」、「食品安全」等我也都是後來才慢慢知道的。雖然在做生意的時候還有在接觸農業，但是主要是老一輩再做，那個時候我農藥也是用得嚇嚇叫，哪知道會有毒性會是殘留甚麼的，我們沒有去學習，只知道很有效。話說回來，農藥也是政府引起的，農藥「好年冬」推出那一年，好好用，哪一家沒有用，藥性還是現在的兩、三倍。現在政府在推有機，也算是在彌補以前的錯。(農民 A)

為什麼我不去申請吉園圃？我覺得吉園圃輸我阿，我是完全不用農藥了，吉園圃還是只是在「(農藥)未檢出」就好了，那我幹嘛去認證這些？有機認證我也做不到，而且台灣的有機也有很大的問號存在。所以我情願做「無毒」，不用農藥但是會用化學肥，我到現在還是認為我是正確的。(農民 A)

事實上以「有機」、「無毒」、「環境友善」的方式生產，注重「吃健康」、「保護土地/土壤」的生產邏輯與倫理，也形成與前述學術思考相對應、媒合 (match) 的地方基礎。隨著社會的進步，健康飲食、環境保護本來就逐漸成為主流，這樣的追求不只是能讓依賴農業收入的他們邁向另類的產銷通路，也讓他們發覺自己做為生產者的價值，貫徹自己要務農的決心。農民 B、農民 C 在幾年前都已經改以「無毒」、「環境友善」的方式生產當地，並對此引以為豪，其他尚維持慣行耕作的農民，雖然沒有為此立即改變耕作方式，但是也正在觀察著這樣的新概念是否真的可行，未來友善農法是否能成為農業生產主流，恐還需要搭配農會的推廣和中央政府的政策配合。至於在稻米的產銷通路上，農民 A 也勇敢做出新的嘗試，與上下游合作賣米，並自己訂出一個連消費者都覺得便宜的價錢。過去繳交公糧

和與農會合作的經驗都不用處理後續包裝、行銷的問題，但上下游希望農民的個人故事和堅持可以被消費者直接看到，因此與農民 A 花了很多時間討論彼此的理念、默契，還有如何包裝、定價、銷售、出貨等執行細節，這也都讓農民 A 必須去思考、解決之前農業經營上可以逃避的困難，進而在產銷上朝著自己口中的理想有更進一步的實踐連結。

還沒有跟上下游合作之前我自己也有在賣米，但是賣的量不夠大，能夠繳公糧的就拿去繳公糧，剩下的才自己賣給親朋好友。桃園三號好吃但是量比較少。如果就是為了交公糧²²的話就不會種桃園三號，因為量少價錢又沒有比較好。上下游跟之前的通路都不一樣，以前就賣給附近的人，賣不完再拿來養雞養鴨，農會也有幫我販售，但是竹東農會的量不大，又沒有名氣，很難跟外面的大廠牌競爭。上下游也是因為跟農陣的連結，知道我這邊是再用無毒的方式栽種，知道我們有銷售的困境，所以來跟我談，那時候也有談一些條件，他們認為我的利潤要高，但是我覺得農民只要賺他們該賺的就好了，外面有一些小包裝米都太貴了。…上下游在賣的東西也不是甚麼人找他他們就賣，而是要看看這個農民對土地和農業的認同。(農民 A)

農民 C 的農業價值同時也在慢慢轉變²³，雖然一直以來他的反徵收態度都很強硬，但是過去從事園藝營造的他花比較多時間在自己家園周遭的園藝造景上，在抗爭上的論述也比較從法律、農民的財產權、生存權等偏向個人權力的方向切入，而在這一兩年間與整個網絡互動後，開始注重農業的公共性特質發展，也賦予務農更重要的意義：以前政客都會騙農民說，「你現在不趕快變更土地就一輩子都是種田的」，現在如果是跟我說的話，我會說，「我十輩子種田都不關你的事，這是

²²以民國 101 年第二期作公糧稻穀收購梗種數量、價格為例：每公頃農地收購數量(乾穀)：第一階段計畫收購 1,500 公斤，梗種稻穀每公斤 26 元。第二階段輔導收購 800 公斤，梗種稻穀每公斤 23 元。第三階段餘糧收購 2,400 公斤，梗種稻穀每公斤 21.6 元。

²³ 農民 B 在論文撰寫後期因個人健康因素，農事上的活動減少許多，因此論文後段與農民 B 相關的篇幅和討論減少許多。

我的榮幸！」過去把重心放在抗爭技術上的農民 C，在網絡互動和農業論述形成的過程中，也開始重視起自己的農業生產。事實上，這一、兩年農民 C 就曾在自救會內發起「永續務農意志書」的連署。有別於過去許多徵收程序都是讓農民處在被動接受政策的狀態，農民 C 想到以「永續務農意志書」來主動展現當地反徵收農民的意志和想要持續務農的決心，於是蒐集當地近兩百名農民的連署之後，便將連署書以雙掛號寄到縣政府存證。除了持續關注縣政府的徵收動向，農民 C 也開始提起他這期種了跟得獎的農民 A 一樣的桃園三號香米，還有他收割時要舉辦體驗活動，讓大家來嘗試手割水稻、用傳統木造的脫穀機脫穀等等。

當然，農民在公眾面前所說出的論述並不代表內心百分百的認同，也不一定確實展現在行動中。不過，本研究從整個運動過程來看，確實可以看到這群農民在農業價值上的轉變，從過去工具性明顯的價值，又再附加了一些理念意義在上面。徐肇尉（2012）認為，網絡行動中的關係實踐形式並非穩固恆常，不同行動主體間常常展開溝通與協商，來來回回的不斷互動、建立關係，並持續地更改與調整互動的方法，而維持多變的關係實踐。行動中溝通的協商形式，通常是人與人之間對某個事件尋求共識的討論過程，但除此之外，人與非人實體間的協商也經常發生，經由反身體主體的「身體」在兩者間的「實作」而展開（徐肇尉，2012）。徐以農民的田間實作來呈現人與非人實體間的協商過程，過去農民透過除草劑、肥料、農藥來「規範化（normalization）」的安排土地與農作物（非人行動者）以進行農業生產，但當知識論述改變後，農民需要透過更敏銳的觀察和文化回溯，進行順應土地、農作物和環境的脈動來改變自己的田間實作方式，這便是人與非人行動者間的協商和轉化過程（徐肇尉，2012）。也許在農民具體的實踐上還不如論述的內容豐富而直接，但是從長遠的農業發展來看，也許現在正處於台灣農業歷史的轉捩點也說不定。

本研究欲呈現的並非田野抗爭個案的特殊性，而是想要提出，過去抵擋在行動者間的類別、階級等區隔，是可以靠著「文化轉化」來相互理解，將原本壁壘

分明的差別轉成具有共同行動目標的大網絡，因此透過網絡的方式理解不同行動者和實踐主體農民如何行動是重要的。雖然在網絡中不同行動者皆是平等的，但是大家同時也要明確的意識到目標的實踐主體為何（在本研究的網絡中實踐主體即為農民），網絡中的不同行動者要與實踐主體充分的理解、認同，才能確實進行文化轉化，讓運動中的內涵和意義透過實踐主體的實踐不斷堆疊、累加，成為有生命活力的動態網絡，這也是文化轉化對於基層動員的重要性所在。



第六章 結論－抗爭下農民主體如何實踐

6.1 運動型態的轉變與價值轉化

從第四章的網絡描述開始，即可以感受到農民在網絡當中的角色與其他行動者無異，都是對當下面臨到的機緣，做出符合地方和個人脈絡的應對或是選擇。但是不可諱言，主要形成反新圈地運動網絡的重要節點（nodes）都與農民直接相關，這也是第五章所強調的一讓「文化轉化」順利形成的農業文化要素。整個反新圈地運動中，不管是反徵收農民或其他行動者，皆透過強調農民繼承的農業文化要素，在象徵論述、產業論述，和最重要的實體互動上，農民逐漸有機會主導與自身最相關、關於農業發展的詮釋權，以致相關的討論從過去官方釋出的大方向式空談，直接落到很明確的農業訴求上，諸如保留農地、支持優良農產、促進城鄉平等，變成為吸引大眾支持的原因。這也代表，這是一個農民逐漸學習從過去的回應傷農政策走向的消極式抗爭，邁向可以對農業產生個人發展見解的主動式抗爭的重要過程。

回顧這兩年來的農民運動，確實和過往大家對農民就是弱勢、主打悲情訴求的苦情印象有很大的差距。但苦情與悲情並非不存在反新圈地運動中，事實上在一開始許多農民突然得知自己的家園田地將要被徵收，自己卻看不懂公文、對相關法條規定一竅不通，這些時候也只能在媒體前悲情控訴國家的不公不義與霸道。但是當一些關鍵的事件和行動者作為連接起反新圈地運動網絡的節點，不同的群體有機會對話彼此的目的後，整個運動情勢才隨之改變，農民主體所散發的影響也更為深刻。

過去的農民主體並非不存在，只是在台灣發展追求現代化、都市化的過程中，為了追求效率所產生的物化、量化視野，都讓農民、農村與其他群體開始產生斷裂，雖然不同群體的目標不見得有很大的差異，但是文化習性、知識形式、認知

或是意識形態都漸行漸遠。務農人數減少是大家逐漸對農業陌生的原因之一，但農人作為實踐農業的生產者，卻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持續被壓抑、在產銷的過程中被剝削，抽離對農作物的自主權，導致消費者只看的到農產品作為商品的價值，看不到農民生活的樣貌，農村環境也僅被當成一般大眾休閒的去處，農村景觀、設施與農業生活的關聯性被忽略。在過去以農立國的時代，農村是每戶人家生活、成長的必然經驗，但對現代人來說，農村經驗逐漸成為他者的奇異經驗，對農村居民來說，務農賺不到甚麼錢，又不受尊重，想把土地作為商品換成現金另尋出路也是沒有選擇後的選擇。但是當農民選擇為了保留土地而挺身而出時，他們身上所繼承的農業文化就是他們充沛的武器，透過網絡的互動，農民學習、有機會用不同的方式展現他們的農業文化，讓大眾重新思考農業的內涵和價值。換句話說，整個抗爭運動的過程包含雙重的轉變。像是插秧、曬穀和祭拜五穀神農這些出現在農民日常生活和農業勞動中的行為，原本是農民和農陣為了應對政府極度的壓迫才決定以象徵性的方式、移到凱道上進行「展演性」的宣示，這些主動性的表達卻無意間，透過強烈的視覺感受和實體接觸，同時轉化了一般大眾和聲援知識團體對於農業的觀感和公共性認知。另一方面，竹東反徵收農民優良的稻米競賽成果和友善耕作農法都成為他們重視農業和土地的最佳證明，不同的農業軸線分頭進行卻又同時交會、影響著，這便是這個運動之所以開始發酵、受到關注的重要轉變。

6.2 未來研究建議

整個抗爭網絡變動的過程中，內部的人際互動並非十分穩定、和平的，在當地徵收階段程序沒有那麼急迫緊張時，不同的行動者仍會存在各自生活上的利益衝突，這些都是本文尚未能進一步討論、處理的。本研究也受限現實條件，未能在當地做更細緻的蹲點、實際參與當地農民自救會的抗爭會議，希望未來研究能夠更詳細記錄農民生活中的農業態度或轉換農業價值的過程，並與過去的農民運動提出經驗上的對照比較，相信對農民運動的發展和轉變會有更深刻的了解。



參考文獻

一、國外文獻

- Atkinson, P. and Hammersley, M. (1994) 'Ethnography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N. Denzin and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248-61.
- Baukó, Tamás and Imre Gurzó. (2001). Dilemmas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Hungary: The EU Accession Partnership and the Sapard Programme.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8(4): 361-369.
- Byrne, B.(2004)'Qualitative interviewing', in C. Seale(ed.),*Researching Society and Culture, 2nd edn.* London: Sage. Pp. 179-92.
- Callon, M. and J. Law. (1995). Agency and the hybrid collectif.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94 (2), pp.481-507.
- Chayanov, A. (1996[1925])。農民經濟組織。中央編譯出版社。
- Earl (1998[1988])。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下)。台北：石英出版社。
- Evans, Nick et al. (2002). Conceptualizing Agriculture: A Critique of Post-Productivism as the New Orthodoxy Progres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6: 313-332.
- Feagan, Robert. (2007). The Place of Food: Mapping out the 'Local' in Local Food System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1(1): 23-42.
- Goodman, David. (2003). The Quality 'Turn' and Alternative Food Practices: Reflections and Agend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 1-7.
- Ilbery, B and Moya Kneafsey. (1998). Product and Place: Promoting 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the Lagging Rural Reg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5(4): 329-341.

- Latour, B.(1986). The Powers of Association. Pp.264-280.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Latour, B. (1999). On recalling ANT.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Pp15-25. Oxford: Blackwell.
- Law, J. (1999). After ANT : complexity, naming and topology.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Pp1-14. Oxford: Blackwell.
- Lockie, S., and Kitto, S.(2000).Beyond the farm gate: production-consumption networks and agri-food research. *Sociologia Ruralis*, 40(1), 3-19.
- McAdam D.(1999).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Univ. Press, Cambridge .
- Scott J.C. (2001[1976])。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譯林出版社。
- Scott J.C. (2007[1985])。弱者的武器。譯林出版社。
- Silverman (2009[2004])。解析質性研究法與資料。新北市永和區：韋伯文化國際出版。
- Snow D.A., Rochford E.B., Jr., Worden S.K., Benford R.D.(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464-481.
- Swidler A.(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273-286.
- Urry J. (2007[2002])。觀光客的凝視。國立編譯館。
- Wallerstein I.M.(1984).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 essays* Cambridge Univ. Press, Cambridge.
- Williams R.H. (1995) . Constructing the Public Good: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Social Problems* 42:124-144.

二、國內文獻

- 王良行（2007）。竹東鎮志：經濟篇。新竹縣竹東鎮公所。
- 台灣農村陣線（2010）。2009夏耘農村草根訪調。台灣農村陣線。
- 台灣農村陣線（2011）。2010夏耘農村草根文集。台灣農村陣線。
- 台灣農村陣線（2012）。土地正義的覺醒與實踐：抵抗圈地文集。台灣農村陣線。
- 何明修（2004）。文化、構框與社會運動。臺灣社會學刊：157-199。
- 吳聰賢（1985）。傳統與現代化農民性格內涵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第59期。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 李丁讚、林文源（2000）。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台灣的歷史形成；1970-86。臺灣社會研究：133-206。
- 林文源（2007）。論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行動本體論。科技醫療與社會：(4) 65-108。
- 柯志明、翁仕杰（1993）。台灣農民的分類與分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2：107-50。
- 徐世榮（2001）。土地政策之政治經濟分析：地政學術之補充論述。正揚出版社。
- 徐肇尉（2012）。後結構地理學取徑下的鄉村空間過程：以「歷坵小農復耕行動」為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博任（2011）。他們如何營生？為何反抗？怎麼行動？—二林農民主體性研究。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向明（2000）。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
- 黃應貴（2006）。人類學的視野。台北：群學出版社。
- 楊弘任（2007）。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台北：左岸文化。
- 楊懋春（1970）。台灣土地改革對鄉村社會制度影響之研究。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

廖正宏、黃俊傑（1992）。戰後台灣農民價值取向的轉變。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蔡培慧（2009）。農業結構轉型下的農民分化（1980-2005）。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蔡培慧（2010）。真實是一場社會行動－反思台灣農村陣線的行動與組織。臺灣社會研究：319-339。

三、報章新聞

Munch(2010)。717農村正義守夜行動—明天過後，美夢成真。漂浪。島嶼—munch，7月26日。

王慧瑛（2009）。竹東徵地 兩派對槓 砸椅傷人 園區三期說明會 500餘地主參與 支持者反對者火爆衝突 多人掛彩。聯合報，B2版，7月2日。

王慧瑛（2011）。明天來竹東 地瓜控窯 吃米冰淇淋 二重里五穀宮旁 農民市集、米食DIY 嚐無毒栽種台農57號地瓜。聯合報，B2版，12月9日。

王慧瑛（2011）。帥帥農夫不務正業 種出好米。聯合新聞網，9月23日。

何榮幸（2011）。我見我思－竹東神農無田可耕。中國時報，11月9日。

呂苡榕（2011）。國際組織關注土地徵收 聲援台灣農民。過於孤獨的喧囂，7月6日。

李一凡（2007）。竹東二重埔的美麗與哀愁。客家電視台，客家新聞雜誌第51集。

李彥甫（1995）。新竹科學園區第三期徵地工作延宕近十八年 竹縣部分土地 國科會放棄徵收。聯合報，06版，3月6日。

李珣瑛（2002）。鄭永金：竹縣將創造3.5萬個工作機會 全力推動竹科線三期與璞玉計畫 營造優質生活機能。經濟日報，4版，8月29日。

李煜梓（1989）。科學園區第三期土地徵收 竹東中興路業主有異議。經濟日報，10版，9月28日。

李煜梓（1989）。科學園區第三期徵地若續進行 部分地主揚言將再圍廠抗議。經濟日報，04版，11月26日。

李煜梓（1990）。園區三期用地徵收暫譜休止符 新竹不少廠商表示不解與惋惜。經濟日報，18版，7月19日。

李煜梓（1991）。園區三期徵地案前途未卜 正反業主座談仍各持己見。經濟日報，18版，3月29日。

李煜梓（1994）。他山之石 傳統米食成功打入市場 改良包裝及結合新的行銷通路終轉虧為盈。經濟日報，15版，1月26日。

林建成（2010）。凱稻美濃收割 訴求仍落空。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11月15日。

徐慧玲、林敬祐（2010）。大埔事件簿 「新農民運動」儼然成型。客家電視台。

徐養齡（2011）。都是桃園三號香米 竹東稻米賽 前三名只差0.1分。聯合報，B2版，8月27日。

章雅喬（2011）。我的綠體驗 田裡有黃金！歡迎來挖。聯合晚報，A10版，12月9日。

莊閔靜（2012）。關懷農民 教授學生幫插秧。聯合報，B1版，3月5日。

陳寧（2010）。手割美濃凱稻 農民誓言奪回土地正義。苦勞網，11月14日。

陳權欣（2011）。種出十大好米 良田面臨徵收。中國時報，9月24日。

彭宣雅（2010）。促修法停止強徵農地 農民之路 揚言五都選前重返凱稻 凱稻秧苗鋪成綠油油稻田。聯合晚報，A1版，7月18日。

彭宣雅（2011）。躺在凱稻 想到祖先 一夜難眠。聯合晚報，A2版，7月17日。

馮小非（2011）。史上最優惠的經典好米，卻是最憂愁的生產者—稻農阿燈。上下游工作誌，11月4日。

黃國樑（2011）。農民反對徵地 政府將以地易地 回應農民訴求 吳揆指示要劃設專區 讓反對開發計畫的農民繼續務農。聯合晚報，A2版，7月17日。

楊淑閔（2011）。產十大經典好米農地亦被徵用。中央通訊社，11月10日。

劉開元（2011）。農民上街頭反圈地 國際聲援。聯合晚報，A7版，7月6日。

蔡孟尚（2009）。鞭炮趕鳥 彭英雄種出無毒冠軍米。自由電子報，8月13日。

蔡孟尚（2010）。種出冠軍良質米 莊正燈：別徵收我的地。自由電子報，8月11日。

駱焜祺、李青霖（1989）。政府徵收農牧用地 傳有違法舞弊情事 兩百多名地主 對鎖科學園區 新竹市聯外交通一度癱瘓 園區內協調達成四項協議。聯合報，04版，8月29日。

鍾聖雄（2011）。再見「凱稻」。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7月18日。

鍾麗華（2011）。經典米農田被徵收 網友買米打氣。自由電子報，11月14日。

